

Creativity 创意
20
30

No Poverty
无贫穷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reativ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r the auspices of UNESCO
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绿色印刷产品

<http://city.cri.cn/unesco-iccscd>

No Poverty 无贫穷



No Poverty
无贫穷

Creativity
创意 2030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reativ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r the auspices of UNESCO
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30
00

20

30

C2030 #6

No Poverty 无贫穷

4 卷首语 / 萨拉·奥兰多

THE BIG PICTURE 大背景

9 生态文明与新冠肺炎疫情/汉斯·道维勒、梅里·马达沙希

13 何谓“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克劳斯·施瓦布、彼得·范汉姆

16 “廉价”国家能否迎头赶上?/里卡多·豪斯曼

18 继续将减贫工作放在核心地位/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萨比娜·阿尔凯尔

THE SMALL PICTURE 微格局

21 重新设计福利国家/爱丽丝·劳斯瑟恩对话希拉里·柯特姆

28 何以安家/茱莉亚·阿尔巴尼

33 健康故事:两位医生为巴基斯坦设计的远程医疗服务/爱丽丝·劳斯瑟恩对话萨拉·赛义德·库拉姆和伊法特·扎法尔·阿加

CHINA LOGS 中国日志

42 设计能为扶贫做什么/汤健

44 设计教育赋能扶贫攻坚/马牧群

47 乡村妈妈的电商之路

50 河边村的扶贫实验与实践/杨碧琼对话李小云

60 抗疫之年,月事也是事/杨碧琼

VISUALIZE ME 文化视觉

66 环境移民:最后的幻想/亚历山德罗·格拉萨尼

SERIAL INNOVATORS 对话创新者

77 世界粮食计划署:创新和数字化转型,解决人道危机/以技术和数据助力精准紧急救助

CREATIVE SENSES 创意资讯

87 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北京峰会/成都创意设计周/公益艺术教育

96 The Last Page 尾记

版权声明

本刊与投稿者共同拥有已发表文图之版权,所有投稿均可用于本刊衍生出版物及本刊出品方官方网站、微信而无需另行通知作者。本刊文字和图片未经书面批准,一概不得以任何形式和方法转载或者使用。

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即视作者同意授权本刊代理其作品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并且本刊有权授权第三方进行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网络传播;本刊支付的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费用。稿件如未明确标明作者,则为本刊编辑部自撰。

作者言论代表其自身观点,不一定代表出品方的观点,出品方也不以任何形式对此负责。

部分文章未能与原作者取得联系,若涉及版权问题,烦请原作者联系出品方,协商解决。

封面 环境移民:最后的幻想/
亚历山德罗·格拉萨尼

卷首语

萨拉·奥兰多

在本文撰写之际，新冠肺炎疫情依然肆虐。这场前所未有的健康、经济和社会危机仍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生计，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愈加艰难。疫情加剧了已有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弱势群体（非正规经济的从业人员、老年人、儿童、残疾人、原住民、移民和难民）所受重创尤其明显。

身在北京的我可以说是身在地球上最安全的国家、最安全的城市。一年多以来，中国为控制和防范疫情风险采取了强有力的保护措施，有效控制了进一步风险。尽管自身无忧，但我清楚和痛苦地看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仍在苦苦挣扎，在努力防止疫情失控，其中最触目惊心的当属印度和巴西等国。

许多国家已经在开展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计划，国际社会也掀起了一场关于全球医疗卫生和健康贫困的更重要的讨论。

这个问题极其重要，但现在讨论为时尚早，因为科学家和各国政府还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问题留待以后，再作更严谨的讨论。

《创意2030》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出品的特辑，我们致力于通过创意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过去一年来，疫情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的各项目标造成了强烈冲击，许多领域需要更加紧迫的共同关注和回应。于此，本期《创意2030》将聚焦目标1：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仍然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事实上，这也是2017年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时的首要关切。“消除贫困”的目标在疫情暴发前就已偏离了轨道，更因病毒的大流行而严重恶化。《202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贫困人口几十年来首次增加。”

全球有超过7亿人，即世界人口的10%，仍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连最基本的需求如健康、教育、水和卫生设施等都难以满足。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的大多数人每天的生活费低于1.9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农村地区的贫困率为17.2%，比城市地区高出三倍多。

虽然生活在极度贫困中的人数在过去30年里减少了一半以上，但联合国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表的新研究警告说，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可能使全球贫困人口增加5亿之多：这将是自1990年以来全球贫困人口首次增加。新冠肺炎疫情使多年的努力付之东流，让针对未来十年的“行动十年”战略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贫困有很多面向，其原因包括失业、社会排斥，以及某些人群极易受到灾害、疾病和其他现象的影响，进而无法生产。

由于气候危机频发，我们将不断经历自然灾害，这会进一步加剧贫困。仅在2018年，自然灾害给63个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236亿美元。我们在“文化视觉”版块介绍了摄影师亚历山德罗·格拉萨尼于2011年开始的长期摄影项目。该项目关注环境移民，因为因环境造成的移民现象以及这些移民的生活状况必定会成为地球上新的紧迫的人道主义问题。

在《202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中，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刘振民说：“预测显示，2020年疫情将使7100万人重返极端贫困，这将是1998年以来全球贫困首次上升。老年人、残疾人、移民和难民因其特定的健康和社会经济状况更有可能受到新冠肺炎的严重影响。同样地，疫情也在对全世界的妇女和儿童造成伤害。”

确保对所有人，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对减贫至关重要。尽管如此，全球仍有一半以上的人口（2016年为40亿人）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其中许多人从事非正规经济，他们的收入在疫情暴发后的第一个月下降了60%。

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弱势群体。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工作贫困也在影响数字工作者，他们往往无法获得社会保障（这在疫情期间尤其令人担忧）。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贫困人口几十年来首次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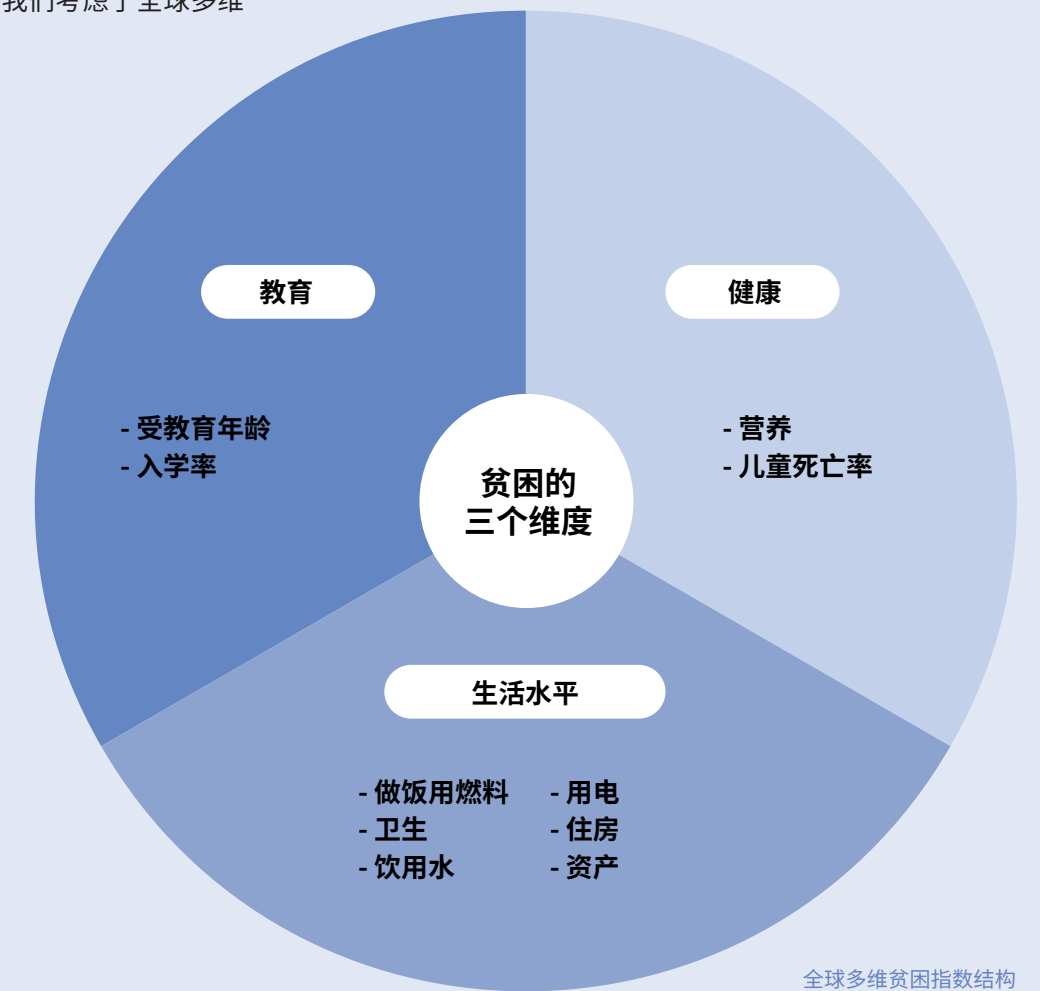
疫情还使几十年来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步出现倒退。如果说在工作贫穷方面性别差距几乎已经消除，那么正在出现的证据表明，疫情对女性的冲击远远超过男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决定在本期探讨一个与贫困和性别平等紧密相关的话题：经期贫困。

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待遇差距也在扩大。疫情暴发以来，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容易面临系统性的贫困。疫情促使我们在本期探讨数据及数据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也是《202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中提出的一个关键话题：“数据对于理解、管理和减轻疫情对人类、社会和经济的影响至关重要。它们对于设计短期应对措施和加速行动，使各国重返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轨道也至关重要。”作为数据创新的案例，我们挑选了多哥为整合地理空间和统计信息而实施的实验Novissi，以及世界粮食计划署的Building Blocks项目，此项目创造性地将区块链用于帮助难民解决饥饿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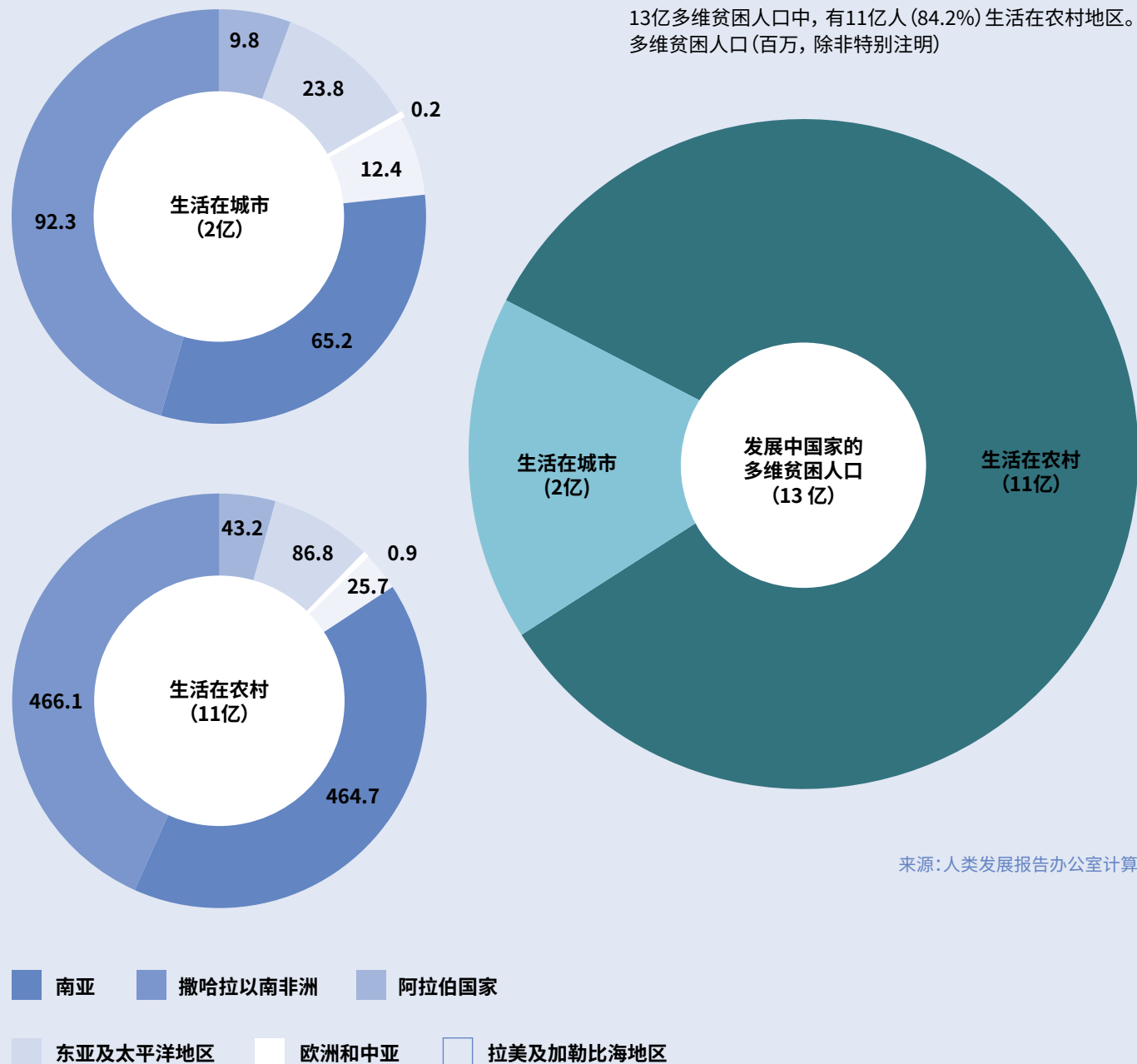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对贫困的定义。过去我们只用货币来定义贫困（每天1.90美元的全球贫困线标准），但在选择本期稿件时，我们考虑了全球多维贫困指数（MPI）。

MPI概念是在2010年由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共同提出的，该指数衡量每一年贫困人口生活的复杂性，从健康、教育和生活水平这三个同等权重的方面考察每个人的贫困状况，精确识别谁是穷人以及他们为什么穷。

2020年《MPI报告》的关键发现显示，在107个发展中国家中，有13亿人（总人口的22%）处于多维贫困状态。其中一半是18岁以下的儿童（6.44亿）：每三个儿童中就有一名身处贫困，而成年人的贫困比例为六分之一。1.07亿多维贫困人口在60岁或以上——疫情期间，这个数字尤为重要。大约84.3%的多维贫困人口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5.58亿）和南亚（5.3亿）。包括中国在内的十个国家的MPI值几乎减半。桑托斯和阿尔凯尔在“大背景”版块发表的文章表示：“MPI显示，在所研究的75个国家中，有65国在过去十年中大幅减贫。”



13亿多维贫困人口中，有11亿人（84.2%）生活在农村地区。
多维贫困人口（百万，除非特别注明）



来源：人类发展报告办公室计算

此外，在全球超过13亿贫困人口中，84.2%的人生活在农村地区，因此更容易受到环境威胁。

在本期中，我们试图同时探讨农村和城市的贫困问题，后者在未来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将生活在城市。

本期大部分文章对实际的扶贫经验、地方社区的赋权发展项目、高度创新的数字驱动应用和尝试进行了批判性思考，这些应用和尝试将推动未来10年的讨论和可能的实用解决方案。

2020年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中国日志”板块的许多文章向读者介绍了有影响力的扶贫行动和项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4月发布的《白皮书》中指出：“扶贫

促进了中国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我们选择的一些基本案例研究确实涉及农村的振兴问题。

总的来说，我们在本期探讨目标1时始终遭遇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不平等”。借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话说：“虽然我们都漂浮在同一片海面上，但很明显，有些人坐在超级游艇上，而其他只能依附在漂流的残骸上。”



EXPERTS COMMITTEE 专家委员会

Stefano Boeri (Italy), Adam Casals (Spain), Chen Anhua (China), Chen Dongliang (China), Chen Ping (Germany), Chen Wei (China), Ding Shuo (China), Yann Debelle de Montby (France), Kenya Hara (Japan), Soon-In Lee (South Korea), Mugendi M'Rithaa (Kenya), Mehri Madarshash (Canada), Feng Changchun (China), He Renke (China), Li Changle (China), Qian Yuan (China), Xiang Yong (China), Xiao Yong (China), Xu Ping (China), Zhang Xiaoming (China), Zheng Changling (China)
(in alphabetical order by last name)

斯坦法诺·博埃里(意大利)、亚当·卡萨斯(西班牙)、陈安华(中国)、陈冬亮(中国)、陈平(德国)、陈伟(中国)、丁硕(中国)、雅恩·蒙特比(法国)、原研哉(日本)、李淳寅(韩国)、穆甘迪·姆托瑞达(肯尼亚)、梅里·马达沙希(加拿大)、冯长春(中国)、何人可(中国)、李长乐(中国)、钱源(中国)、向勇(中国)、肖勇(中国)、许平(中国)、张晓明(中国)、郑长铃(中国)
(按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Official Website 官方网站：
<http://city.cri.cn/unesco-iccsd>
Official Wechat account 官方微信：
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Official Weibo account 官方微博：
UNESCO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Email 投稿邮箱：
media@unesco-iccsd.com
TEL 电话：
0086 (0) 10 5973 5230



Creativity 2030 创意2030特辑

PRODUCER 出品方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reativ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r the auspices of UNESCO (Category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EDITOR IN CHIEF 总编

Xiao Lan 肖澜

CHIEF ADVISOR 总顾问

Hans d'Orville 汉斯·道维勒

EDITORIAL TEAM 编辑团队

2030 is developed by BSide Design
www.bside.design

Chief Editor 主编

Sarah Orlando 萨拉·奥兰多

Chen Jie 陈洁

Creative Director 创意总监

Beatrice Leanza 毕月

Vittorio Sun Qun 孙群

Editors 编辑

Yang Biqiong 杨碧琼

Heather Mowbray 毛海哲

Wu Wenbin 武文斌

Lang Lang 朗朗

Liu Lang 刘琅

Zhao Min 赵敏

Liu Yanting 刘燕婷

Graphic Design 平面设计

LAVA Beijing LAVA北京

lavabeijing.com

Translations 翻译

Today Translation (Beijing)

北京今日华美翻译有限公司

Editorial Supervisor 编审

Huang Jing 黄静

OPERATION TEAM 运营团队

Cesamedia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Shanghai) Co., Ltd.

祺山广告传媒(上海)有限公司

8610-6952 1122

PRESIDENT 总裁

Fausto Tatarella 方思来

Maggie Li 李劼

Li Jingtao 李景涛

大北背景

生态文明与 新冠肺炎疫情

汉斯·道维勒、梅里·马达沙希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迫使人们反思世界地缘政治的未来，包括全球合作、全球治理、全球化、科学、技术、研究，以及各种形式的多边主义。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反思我们与自然、地球上所有资源和生态系统的关系。新冠肺炎危机突显了自然破坏对社会、经济和人类福祉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多么脆弱。

我们与大自然的关系破裂是否导致了新冠病毒的大流行？我们已然破坏了我们的星球——我们砍伐森林以便扩大粮食生产，我们忽视了地球的生态系统，不断钻探更多的石油、煤炭和其他有害物质，我们污染了水和空气，破坏了栖息地导致物种灭绝。人口过剩，为了给人类提供住房，消除饥饿和贫困，我们增加了人、牲畜和野生动物之间的身体接触和亲密度。结果，人类暴露于动物病原体，导致出现若干种人畜共患疾病。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尚未解决的社会紧张局势。世界已经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环境和气候危机，已经在与粮食和水资源短缺、能源波动、自然灾害、经济衰退、大规模失业和金融不确定性作斗争，断然没有准备好应对这样一场重大的全球卫生危机。

与本世纪前两次全球衰退不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是供应和需求两方面的冲击。事实上，新冠肺炎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人类第六次大流行病（之前是麻疹、不同类型的流感/流感、非典、埃博拉和中东呼吸综合征），表明在全球相互依存和日益碎片化的世界中，此类危机正变得更加复杂。

全球化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虽然全球化确实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但它也导致了严重的不平等，目前在疫情之下也造成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的攀升。

这场疫情显示了在危机来袭时做好准备的重要性。它还表明，迟迟不敢做出大胆决策，可能会付出巨大代价。很明显，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健康危机，政府缺乏准备。可作为类比的是，在应对气候



汉斯·道维勒
(Hans d'Orvill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战略规划助理总干事



梅里·马达沙希
(Mehri Madarshahi)
曾任纽约联合国秘书处高级经济官员，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全球文化网络主席、亚太交流合作基金会副主席、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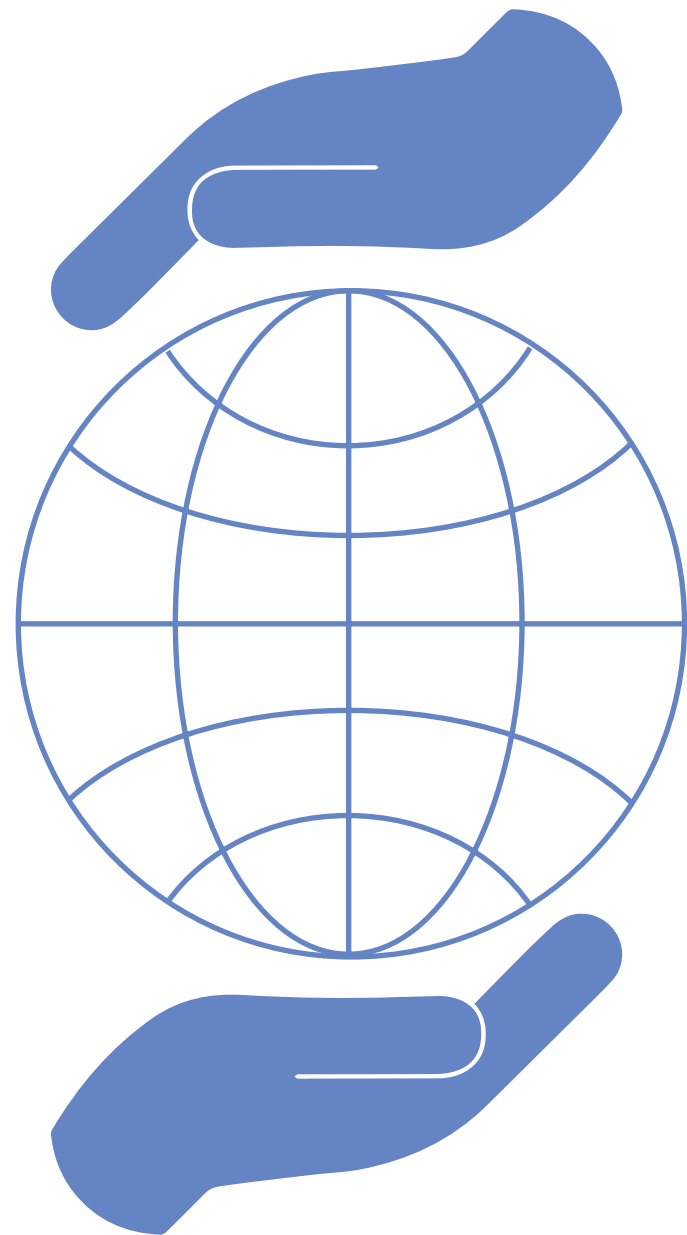
今天的生态危机 根源于我们的文明， 暴露出更为深刻 的人类危机

变暖超过2°C、生物多样性崩溃、过度的空气污染和海洋酸化等挑战时，我们同样缺乏适当的准备。

中国的生态文明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进的方向。这一概念与几十年来联合国决议和方案中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十分相似。这两个概念都是指人类对地球自然资源的利用必须在环境的物理承载能力和长期可持续性范围之内。

生态文明是指以追求人类与周边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形式为核心使命的社会。中国已经把这一概念写入了宪法。但是，这一概念的实施不应仅仅局限在中国，而是所有国家和社会都必须加强实施。

此次疫情突出表明，通过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实践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性。我们需要采取新的办法，因为全球合作、团结和信任的准则并没有得以贯彻。生态文明的核心是赋予所有生物和支持它们的生态系统以内在价值，而不管它们对人类有用或重要与否。所有人和所有国家都必须努力与彼此、与自然和维持生命的生态系统和谐相处。今天的生态危机根源于我们的文明，暴露出更为深刻的人类危机。人类必须把自己看作是地球这个有机体的一部分，和地球一样承受着生态压力和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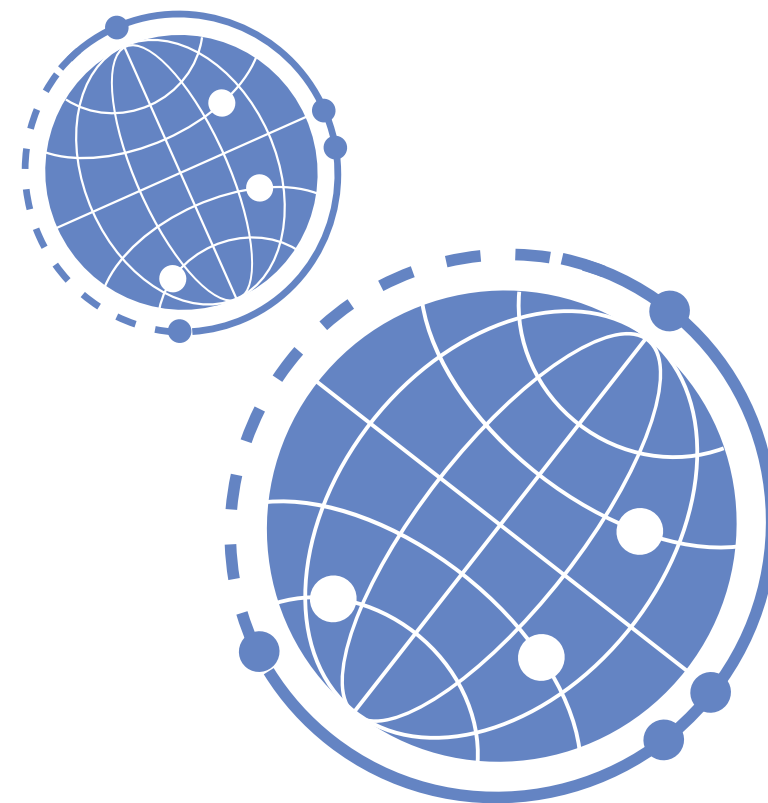
生态文明的前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够以保护而不是破坏自然环境的方式推进。生态文明意味着一致选择全面转型，走向循环经济和共享社会。

生态文明旨在引导消费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会充分利用影响生态和环境的科技创新。数字技术、通信、能源等领域的变革带来了全面数字化、物联网、大数据应用、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它们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了动力。这些可能带来技术和经济的进步，并从根本上重塑我们的思维和行动。这种新的办法谋求以整体的方式综合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需要。我们正处在一场新的生态文明演进/革命的起点。

如果我们能设计出一种恢复方式，修复我们与自然的关系，那么疫情可以说提供了一次改变的机会。我们无法想象人们的行为或活动回到疫情前的“常态”。仅仅调整是不够的，因为问题是系统性的。生态转型和社会平等必须位于经济复苏的核心，才能加强全球应对健康和气候威胁的韧性。

新冠肺炎疫情表明，我们可以做到在消费模式上更加节俭，更好地与环境目标保持一致。疫情期间消费模式的转变暂时性地帮助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减少了交通和工业活动造成的空气污

人类必须把自己看作是地球这个有机体的一部分，和地球一样承受着生态压力和危机



染。各国政府现在面临着一个独一无二的契机，有机会选择绿色和包容性的复苏方案，他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这个复苏方案不仅能提供收入和新的就业机会，而且以福祉为核心有更广泛的目标，能整合强有力的气候和生物多样性行动，并建立韧性。经济刺激计划需要加强，辅以惩罚性措施，与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的宏伟政策相结合。这样的做法可以生成人类、地球、繁荣三赢的政策。

生态文明的发展需要知识的统一和行动的协调。绿色发展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础。为此，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并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合作。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不断发展的全球绿色发展联盟。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所有活动与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并证明任何个人、任何社区、任何城市、任何国家和任何大

陆都不能也不应被抛在后面。然而，疫情也表明，很多国家和社区正在倒退，并在人员和经济方面遭受了严重损失。

绿色转型和过渡会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其驱动力是在整个发展范围内寻求可持续发展。它必须从一套普遍共享的价值观中得到启发，这种价值观从出生到学龄前就被传授，并通过终身学习、教育和创造社会的宽容来保存和完善。人们必须学会相互尊重，在面对全球性威胁时寻求共同点，和睦相处。

绿色增长，就是在不破坏自然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绿色增长认识到自然和环境质量对经济福祉和社会进步至关重要。它要求将经济增长与自然损耗脱钩。这可能需要投资于保护、恢复并可持续地管理生态系统，以确保其能充分为人类做出贡献。如果成功，绿色增长将既能为人类带来经济机会和利益，也能维持并改善当前和未来人类繁荣所依赖的自然资本。

绿色刺激方案不能把环境和经济发展视为二元对抗，而必须把它们视为相互补充和支持的目标。例如，通过恢复森林或沿海和农业生态系统等退化的生态系统，可以创造短期就业和收入，同时有助于长期经济发展和环境可持续性。

新冠肺炎疫情是实施绿色刺激方案的一个契机，其原因一是重振全球经济需要大量投资，二是疫情表明我们有必要通过包容、低碳排放和弹性复苏方案，在文化考虑的支持下，向环境可持续的经济进行转型。

绿色转型和过渡会带来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其驱动力是在整个发展范围内寻求可持续发展

全球团结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分裂的世界战胜疫情。我们必须抓住机会，不分年龄、性别、国籍、种族或族裔，打造属于所有人的未来。保护地球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代际责任。

全球性的生态或生物多样性崩溃将导致不可估量、不可挽回的后果。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需要重新设定我们的生活方式，以有利于整个地球。我们必须大力提倡心怀地球的良知和心态。

全球合作的一个基本步骤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应该分享最佳实践、发明、创新和孵化方法。这样，挑战和机遇就可以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为一种新的、稳定的、有韧性的常态打下基础。这需要进行研究、分享知识、共同建设能力、缔结国家和国际伙伴关系以及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和学术界之间的联盟。还应特别重视城市和城市联盟，以便实现所需的转变。

不解决身上疾病的根源，我们是不会成功的——光治标是不行的。我们必须尊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尊重发展和保护。各方面都要进行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首要一点，我们必须以生态文明理念为基础，创建生态社会！为此，全世界以及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有效、开放和负责任的领导层，以帮助拯救我们唯一的地球。保护地球是当今人类最重要的责任，需要在所有领域采取创造性的解决办法和创新措施。■

何谓“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克劳斯·施瓦布 (Klaus Schwab):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彼得·范汉姆 (Peter Vanham): 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办公室传播负责人

许多政治和商业领袖如今都在争论：“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是否会为我们提供组织经济运作的更好办法？但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它又源自何处？在本文中，我们将明确回答这些问题。

历史

利益相关者这个概念被提出已经超过50年。我首次论述它是在1971年，那时我还是个年轻的商业学者。但它的根源要更深远一些。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如果说一家公司和它的首席执行官在企业成功方面不仅考虑自己的股东，也会考虑享有“利益”的每个人，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核心所在：它是这样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公司不仅为股东实现短期利润的最大化，而且对所有利益相关者和整个社会的需要都会加以考虑，以创造长期价值。

在战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做法在西方很常见，当时人们意识到只有整个社会和经济运行良好，个人或实体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公司与其所处的社会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例如，在我出生的德国，这种做法使得企业的雇员进入董事会，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另外，由于采购、生产和销售主要在当地或至少在本地区内进行，因而企业与供应商、与客户之间也存在着关联。

这培养出了一种强烈的意识，即本地的企业是深深嵌入在它们所处的环境之中的。由此，企业与当地机构——如政府、学校和卫生组织——之间就产生了相互尊重。这就形成了一组利益相关者，我在1971年的《机械工程领域的现代公司管理》一书中做了图示。

此后，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为一些国家所采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北欧和西欧的社会民主制国家，包括瑞典、丹麦、芬兰、荷兰、比利时和德国。

其效果之一是给这些地方带来了集体劳资谈判中由公司管理层、员工和政府组成的三方谈判制度。它也有助于福利国家的形成，在这样的国家

里，公司和雇员缴纳应当由他们承担的税负，为公共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提供资金。

这一做法也在与时俱进，直到今天仍多多少少存在于这些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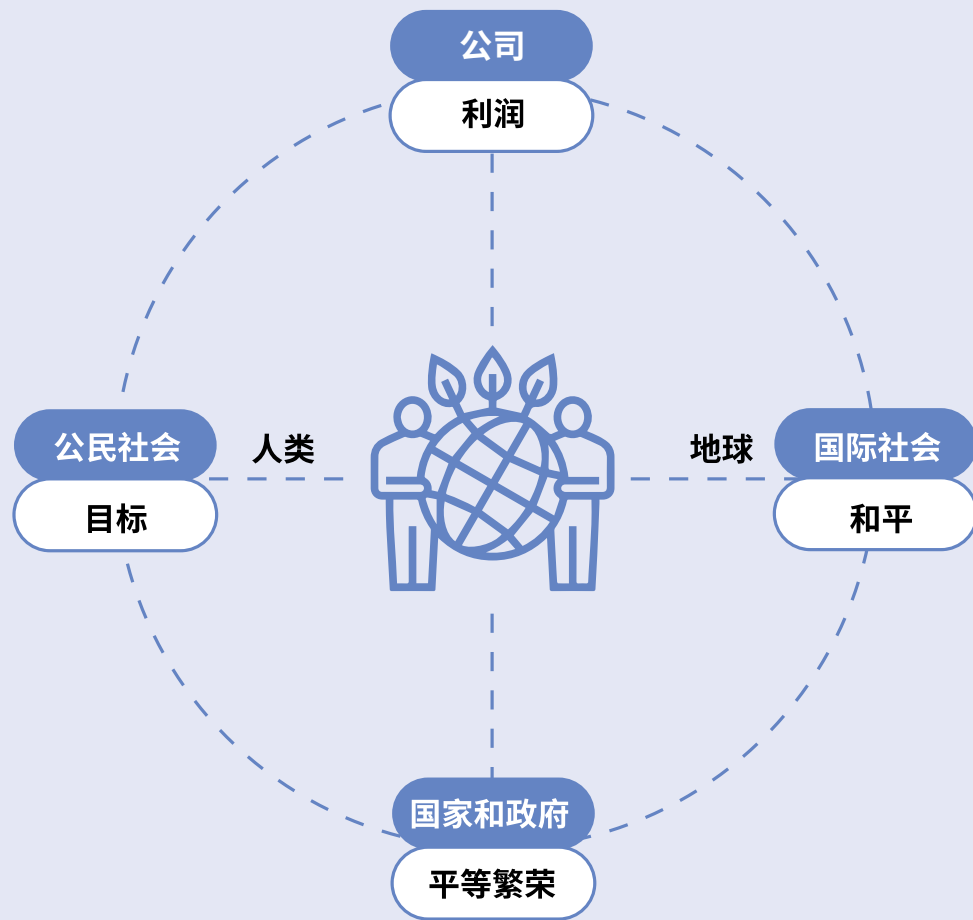
但是，作为全球性的商业组织原则，利益相关者的概念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股东至上”观念发生了直接冲突。弗里德曼认为“企业要做的事情是做生意”（他原话是“公司的社会责任就是赚钱”）——利益相关者概念最终败下阵来。

随着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它们与当地社区和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日渐减弱，转而专注于在全球竞争性市场上为股东争取短期利润的最大化。股东资本主义成为整个西方的商业准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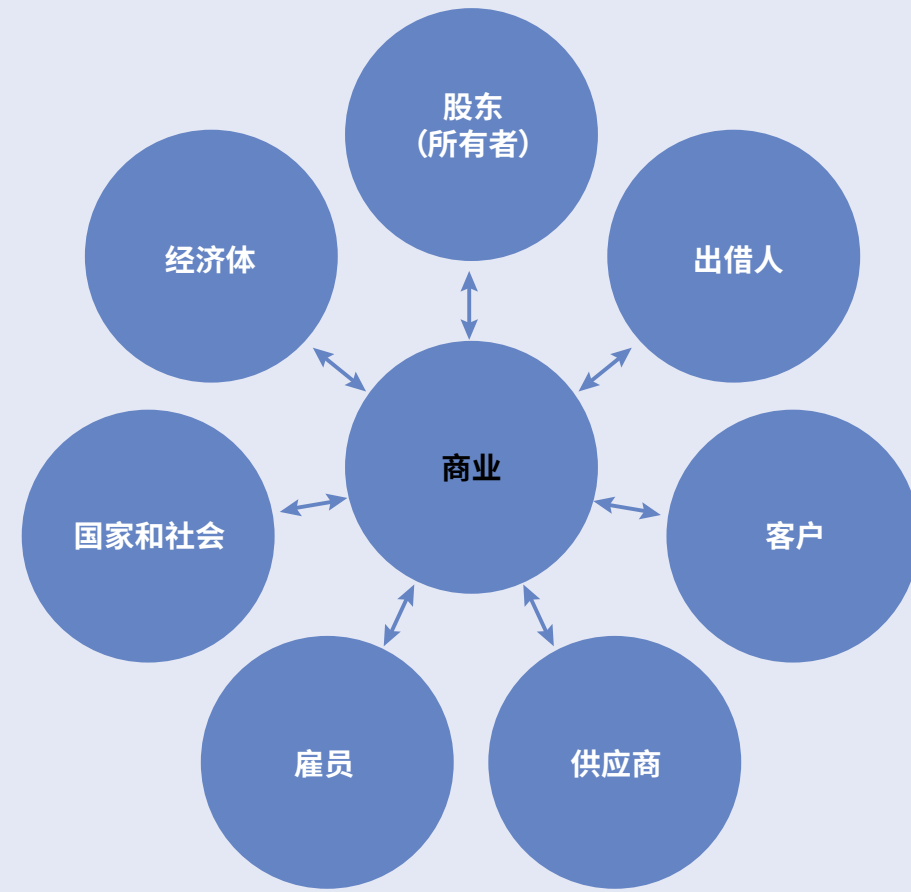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工会、政府及公民社会里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极大地丧失了权力和影响力，这进一步弱化了利益相关者模式得以兴旺所需要的土壤。这意味着，即使在仍然采用利益相关者概念为其治理原则的国家里，随着公司、特别是那些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兴盛起来的公司日渐强大，其他相关行为人的力量正在变弱。

当今的利益相关者模式

以人和地球为本利益相关者概念如今已经准备好重振旗鼓，但其形式将是与时俱进且更为全面的。我们所面临的是全方面的社会、经济和医疗保健危机，对于这些挑战的最好回应，是让社会中的所有行为人超越自身狭隘的、短浅的对自我利益的考虑。那么，当今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应该是何等模样？它又与我父亲那辈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凭着直觉实行的利益相关者管理有何不同？



全球利益相关者模式
图片来源:《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克劳斯·施瓦布和彼得·范汉姆著, Wiley出版社, 2021年



公司位于其利益相关者的中心。
图片来源:《机械工程领域的现代公司管理》, 施瓦布著, 1971年。

当今的利益相关者模式最重要的特征是,我们这个体系的利益如今更明显是全球性的利益。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联系比50年前更加紧密。因而,我们在此提出的模式就其本质而言是全球性的,两个基本的利益相关者也同样如此。

首先对地球来说如此。我们现已知道,地球的健康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或国家的决定,而是取决于世界各地所有行为者的决策之和。如果我们决意为了子孙后代要保护这颗星球,那么每个利益相关者都要承担自己的那一份责任。

在国家经济决策和单个公司决策中曾被视为外部性的东西,如今需要被纳入或内化为每个政府、公司、社区和个人的运作。地球因此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其他所有利益相关者做出的决策,应当保证实现地球健康的最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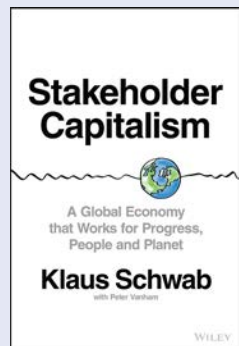
居住于地球上的人类也表现出同样的彼此关联。一个社会中人的福祉会影响到另一个社会中人的福祉,因此我们作为全球公民,每个人都有责任实现所有人类福祉的最优化。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必定会被反噬。

新冠肺炎疫情只不过是再次提醒了我们这种全球性的彼此关联,提醒我们除非人人平安健康,

否则没人平安健康。新冠病毒在全球扩散,摧毁了数以亿计的人的生计,导致数百万人死亡或者患上重疾。除了少数几个岛国,关闭边境并不足以防止病毒的扩散。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传播也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了解其他地方的人们的命运。这让他们开始关注全球平等问题,使这个问题成为重要的行动目标,这在历史上可能还是首次。人是社会动物,他们的绝对幸福不及相对幸福感重要。

因此,不论您身处世界上的什么地方,那里对人类幸福——无论他们在哪里生活——的共识都在增加,而地球作为一个整体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这两个要素是天然的利益相关者,其中人就是所有的个人,地球则是我们所有人所共处的自然环境。这带来一个新的利益相关者模式,这两者在其中居于中心。



《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 克劳斯·施瓦布和彼得·范汉姆著

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及其目标: 利润、目标、繁荣、和平

为了确保人和地球都能实现繁荣,四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它们是:(国家、地区及地方)政府;公民社会(从工会到非政府组织,从学校和大学到行动团体);公司(它们构成私人部门,无论是自由职业者还是大型跨国公司均包含在内);以及国际社会(由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以及欧盟或东盟这样的地区性组织组成)。

所有这些利益相关者都由人组成,都在使用这颗星球,这是关键之处。因此,理所应当,他们应当希望实现所有人福祉的最优化,以及我们生活环境的的质量的最优化。但同样,我们应当清楚,他们都有各自特定的行动目标,这使他们首先是彼此不同的有机体。

政府专注于为最大数量的人创造最大可能的繁荣;公民社会的存在是为了推动其构成者的利益,为其成员赋予意义或目标;公司旨在短期内产生可用利润衡量的经济剩余,在长期内实现价值创造;国际社会的最高目标是维护和平。这就产生了我们如今所知的利益相关者模式,它在全世界普遍有效。当我们以人和地球的福祉为本时,其余四组关

键的利益相关者为其提升做出贡献。这是因为这些组别的利益相关者以及他们的目标彼此关联,若有一组失败,别的组就不可能成功。

这个模式很简单,但它清晰明了地揭示了股东至上和国家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导致次优结果:因为它们专注于特定公司或国家的利润或繁荣这个相对细微和排他的目标,而不是所有人、地球这个整体的福祉。与之相反,在利益相关者模式中,这些相对细微的目标并没有被排除在外,但人和地球的彼此关联和至上福祉居于中心地位,从而确保了将来会取得更为和谐的结果。

如果您想更多了解利益相关者模式,我们邀请您阅读我们的著作《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Wiley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

本文改写自克劳斯·施瓦布和彼得·范汉姆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为进步、人类和地球而运作的全球经济》一书,最初由世界经济论坛于2021年1月22日以2021年达沃斯议程为契机在其网站上发表,之后依据创作共用许可证——非衍生作品4.0版的国际公共许可证以及世界经济论坛的使用条款再版。本文中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不代表世界经济论坛的观点。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1/01/klausschwab-on-what-is-stakeholder-capitalism-history-relevance/>

“廉价”国家能否迎头赶上？

里卡多·豪斯曼



贫困国家往往物价低廉。2019年，1美元在阿根廷、摩洛哥、南非和泰国的购买力是在美国的2倍多；在越南、印度和乌克兰的购买力是在美国的3倍多；在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和埃及则是4倍多。如果一个国家物价低廉，本应更有竞争力，从而能够赶上富裕国家。但事实上，许多“廉价”国家却在日益落后。

乍一想，贫困国家物价低，似乎不合逻辑。如果贫困国家生产力更低，生产商品就要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那成本不应该更高吗？

如果世界各国薪资相同，那情况理应如此。但实际上，贫困国家的薪资远低于富裕国家。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按可比价格计算，2019年瑞士和美国的年平均工资约为6万美元；澳大利亚、丹麦、荷兰和德国约为5万美元；法国、韩国和瑞典约为4万美元；西班牙、韩国、意大利和波兰约为3万美元；希腊和匈牙利约为2万美元；墨西哥约为1万美元。

这些差异表明，也许在某个平行世界，生产力高的国家薪资更高，而生产力低的国家薪资也很低，这样所有地方的产品与服务成本都相同。的确有道理，但这不是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事实情况是，1美元在贫困国家的购买力比在富裕国家更强。

针对这一现象，经济学的标准解释是，尽管贫困国家可能生产力普遍低下，但与生产其他商品相比，这些国家在制造国际贸易商品方面的生产力尤为低下。但这怎么解释贫困国家物价低廉呢？

咖啡和手机等国际贸易商品，价格在全球各地都差不多。如果当地价格过高，人们可以选择进口该商品；如果当地价格较低，那么出口该商品会在国内销售利润更高。

但是，一些所谓的“不可贸易商品”只能在当地销售，比如卡布奇诺、移动服务、理发服务等等，这

类商品的价格在不同国家相差较大。在贫困国家，这类商品常常更为廉价，因为与可贸易商品相比，贫困国家生产这类商品的效率相对没那么低。

问题来了：为什么在国际贸易商品生产方面，贫困国家效率尤为低下呢？最具说服力的答案是，生产率有赖于新技术的采用与适应，需要投入成本去学习。而要收回这些成本，只能依靠此后一段时期超额盈利。

在不可贸易领域，最先采用新技术的人将占据垄断地位，直到成功的模仿者出现。这就让该创新者在一段时间内获得了定价权，能够收回创新成本。然而，在国际贸易商品领域，创新者一开始就需要同生产类似商品的外国公司竞争。缺乏垄断能力，就很难收回创新成本。

技术是指生产食物、提供娱乐或执行法律所需的知识。技术有三种表现形式：体现在工具中的知识；编码在公式、算法、配方与操作手册中的知识；以及意会知识或技能，存在于外科医生、麻醉师等特定技术人员头脑。原则上，编码知识的再生不需要成本，且在没有知识产权的情况下，编码知识可以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像发邮件一样快。因此，编码知识不应是造成贫困国家落后的原因。

但工具通常由富裕国家生产，这些工具本身就包含知识，且占世界商品贸易的40%以上。贫困国家物价低廉，机器就显得很贵：一台同样的机器，在埃及公司看来，要比瑞士公司看来贵4倍。

此外，拥有意会知识是实施任何技术的关键。缺乏意会知识，很容易导致机器、原料与劳动成本



里卡多·豪斯曼 (Ricardo Hausmann)
委内瑞拉前策划部部长；
泛美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哈佛大学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哈佛发展实验室主任

对贫困国家而言，廉价并不万能。相反，廉价可能导致工具或意会知识等技术更加昂贵，关上这些国家走向富强的的大门。不过另一方面，廉价也为贫困国家打开了几扇窗，通过这几扇窗，他们或许能走出困境。

白白浪费。遗憾的是，意会知识很难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相比之下，直接转移人才要简单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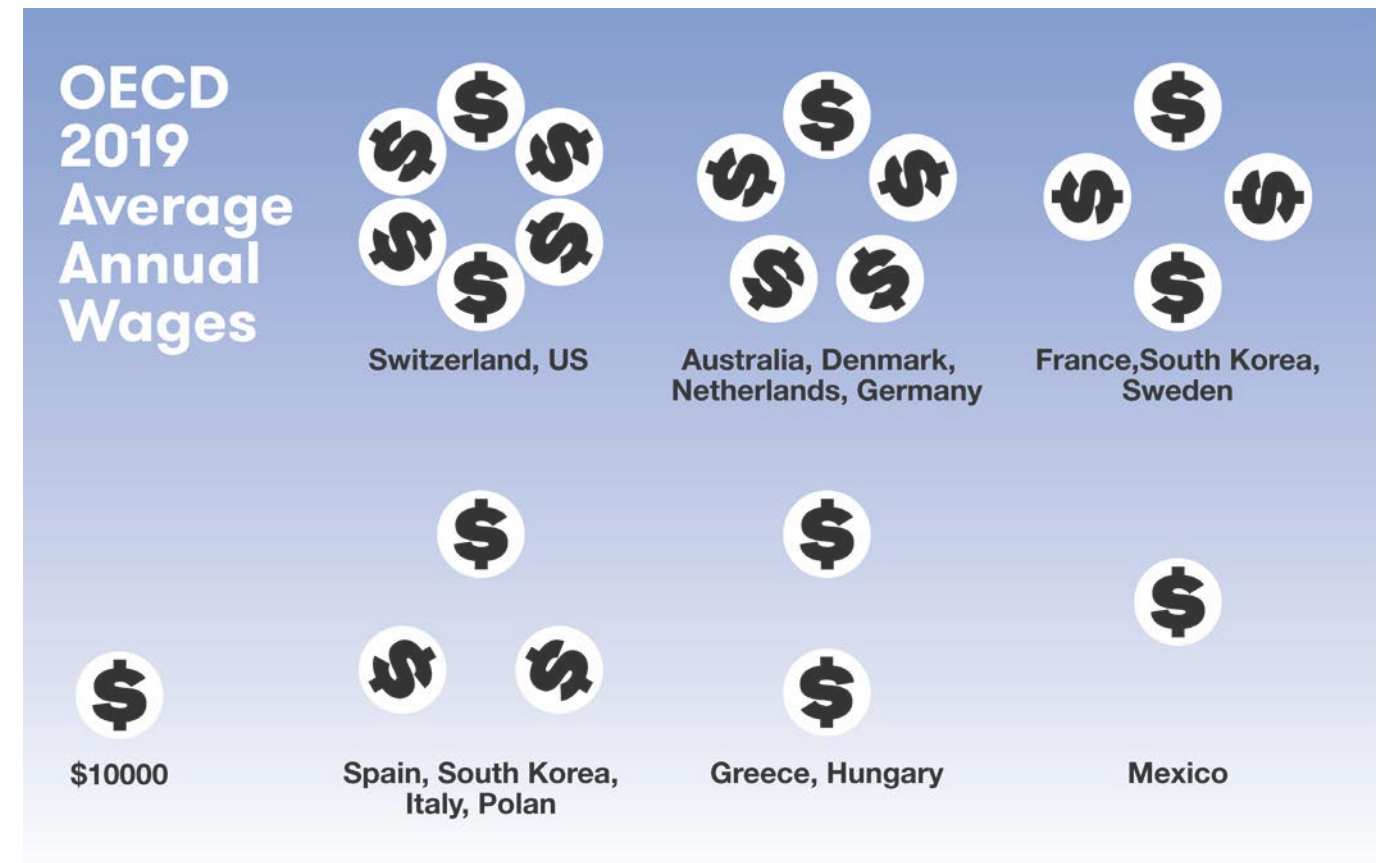
人才转移是技术传播的有力机制，移民、散居、甚至商务旅行都证明了这一点。所谓的“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 services, KIBS）日渐崛起，麦肯锡、埃森哲、哈里伯顿和斯伦贝谢等公司都在提供类似服务。但是，在物价越低廉的国家，这种服务也显得越昂贵。

因此，贫困国家的“廉价”现状，使其更难掌握赶超所需的技术。结果，这些国家依旧贫穷。

不过，廉价也许有办法成为优势。如果贫困国家能够提升能力，出口知识密集型商业服务，那么其公司就会具有全球竞争力，同时也能提高工人生活质量。印度的威普罗和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就是很好的例证。

对贫困国家而言，廉价并不万能。相反，廉价可能导致工具或意会知识等技术更加昂贵，关上这些国家走向富强的的大门。不过另一方面，廉价也为贫困国家打开了几扇窗，通过这几扇窗，他们或许能走出困境。■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1.
www.project-syndicate.org
翻译: Cui Yijia (海国图智研究院)



继续将减贫工作放在核心地位

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萨比娜·阿尔凯尔

今天由疫情引发的人道和经济危机提供了一次超越紧急响应及解决我们经济所存在结构性缺陷前所未有的机会。许多国家政府的刺激和复苏计划都已经在打造未来。但社会各界领袖均应将此时此刻视为建设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未来世界的一次难得机会，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消除贫困看似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但过去废除奴隶制或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也是。2020年多维贫困指数 (MPI) 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出，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该指数不久前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计划联合公布，显示在过去10

年中，所研究的75个国家中有65个实现了国内贫困水平大幅降低。此外，减贫速度最快的国家是塞拉利昂，而且该国是在2014年开始暴发埃博拉疫情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一成绩。

现在的风险是这些成绩有可能被逆转。新冠肺炎疫情不仅需要全球和各国领袖承诺维护来之不易的进步，还需要在终结贫困的全球工作中开辟一片新天地。实现这样的目标绝非易事，因为疫情流行正在导致现有不平等现象加剧。

“说我们处于同一境地仅仅是个神话，”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本月谈到，“尽管我们都漂在海上，但显然有些人坐的是超级游艇，而有些

人只能紧紧抓住碎片残骸。”因此向穷人伸出援手至关重要，穷人正在忍受多重利益被剥夺的痛苦，新冠疫情则导致本已难以承受的负担进一步加剧。

多维贫困指数以始自2010年的数据为基础，同时以10项指标来衡量医疗、教育和生活水平等各项社会生活领域，因此全面反映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体验到的困境。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减轻疫情给生活在多维贫困中的13亿民众所造成的负担，同时还可以防止其他更多人陷入到贫困的境地。从国家角度讲，政府应考虑制定本国专属的多维贫困指数，以指导如何有效实施贫困应对战略。

全世界已经有几十个国家制定了专属多维贫困指数。在本月即将向联合国高级别政治论坛提交自愿国家审查的47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提到了多维贫困。我们希望这些国家能在疫情流行期间充分利用这一有效工具。通过凸显今天对最弱势群体的支持，所有国家都将在疫情结束后的“重建”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消除多维贫困既有利于和平，也有利于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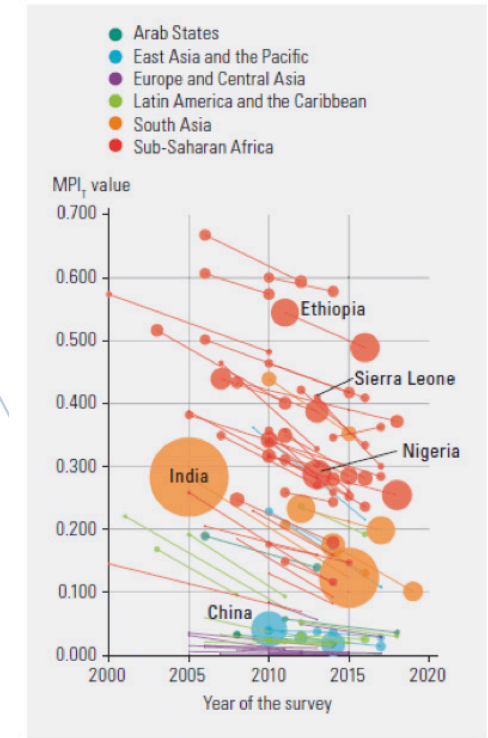
但要开辟扶贫工作新局面，特别需要最高级别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在我（桑托斯）担任哥伦比亚总统期间，我们在助推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FARC) 和平进程的同时，还制定了全国多维贫困指数，不仅关注收入，也关注影响哥伦比亚民众生活的其他社会剥夺问题。在可靠数据的支持下，我们的多维贫困指数作为制定具体计划和政策的基础，成功地在8年间将多维贫困率从30.4%降低到19.6%。

那些尚未制定正式永久性多维贫困指数的国家可以研究全球多维贫困指数能否协助其国内的诸项努力。无论如何，所有政府复苏战略的核心都必须恢复人的尊严和能力。

当然，各国政府不能仅凭一己之力。如此量级的挑战同样需要企业、非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以及慈善人士集体采取行动。现在是时候兑现承诺、采取行动了。领导者必须表现出勇气、决心和毅力，同时将大胆与实用主义相结合。动员社会各界参与消除贫困的共同事业不仅可以惠及穷人，还可以惠及更大范围的经济。

二战结束后，埃莉诺·罗斯福曾指出，“我们不知道每一天将会发生什么。这是个非常时刻。没有时间反复衡量，除了思考我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在这样的艰难时刻，人类有机会以落后者的名义团结一致，并且拿出远见和决心果断采取行动，消除世界各地所有维度的贫困。

初始多维贫困指数值最高的国家和指数较低国家的绝对减少率往往较慢



多维贫困指数基于统一的指标定义，可实现长期严格的可比性。
注：图上数据展示了在本项研究开始和结束阶段的多维贫困水平。气泡的大小表示每年的多维贫困人口数量，颜色表示该国所在地区，连接气泡的趋势线表示减贫的速度，横轴指调查的年份。

来源: Alkire, Kovesdi, Mitchell等, 20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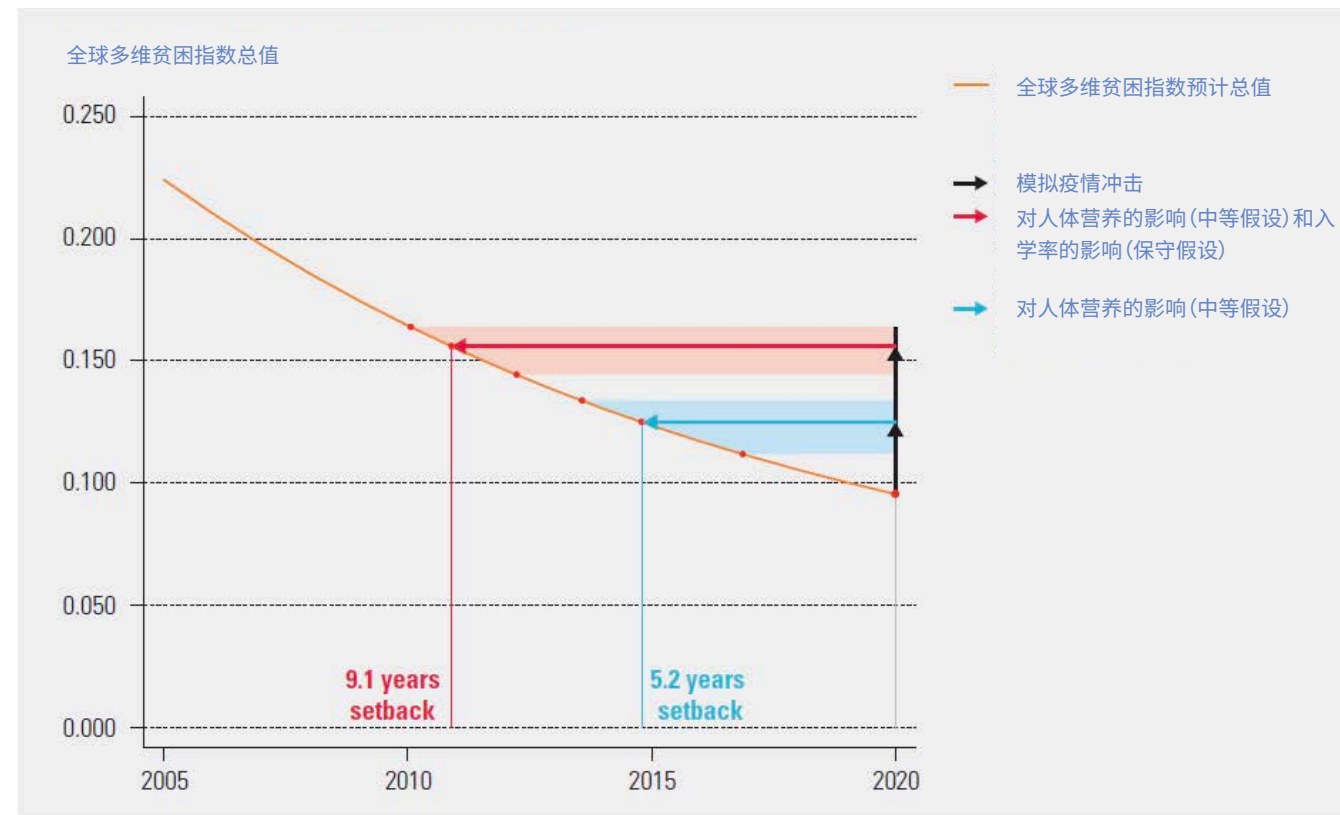
疫情暴发之初，我们的朋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提醒我们，危机时刻好的领导力和坏的领导各自是什么样子。他指出，在二战期间，英国实行配给制以保证更加公平的食物分配，进而支撑了民众寿命的急速增长——男性增加了6.5年，而女性则增加了7年（此前10年，男性和女性寿命仅分别增长了1.2年和1.5年）。

从那次和过去十年塞拉利昂经验所得出的经验是，在困难期间实行实用、前瞻性和公平的政策的确行之有效。让我们祈祷，今天的领导者能认识到他们面前所出现的机遇，并且采用抓住机遇所必须的多维指标。■

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 (Juan Manuel Santos)：诺贝尔奖得主兼哥伦比亚前总统 (2010—2018年)，现任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客座教授。
萨比娜·阿尔凯尔 (Sabina Alkire)：牛津大学牛津贫困与人类发展计划主任。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20.
www.project-syndicate.org

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入学率影响的保守情景假设和对人体营养影响的中等假设下，模拟结果表明，疫情导致的贫困增加可能使贫困水平倒退9.1年，另有4.9亿人将陷入多重贫困。



微格局

重新设计福利国家

专访希拉里·柯特姆
采访：爱丽丝·劳斯瑟恩



希拉里·柯特姆
(Hilary Cottam)

希拉里·柯特姆是一位开创性的社会设计师，她本是一名社会科学家，曾为世界银行工作，之后花了20多年时间来进行实用性实验，试图通过设计来解决当代最复杂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长期失业和老年人照护问题。柯特姆将这些实验成果集结成《激进扶助》一书，并启动了一个宏伟的新项目：重新设计福利国家。她告诉爱丽丝·劳斯瑟恩，项目的目标是使其契合21世纪她称之为“第五次社会革命”的宗旨。

AR: 你是如何发现设计并将其作为工作中的一个有用工具的?

HC: 20多年前,我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工作的时候,很喜欢研究失败的社会方案,想弄清楚为什么个人和组织明明怀着好意、真的在试图解决社会问题,最后却总是失败,或者有的项目原本可以成功,但过了一段时间就失效了。

在《激进扶助》一书中,我举了一个例子: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工作时,教育部请我研究为什么小学入学率那么低。我们被告知,问题在于当地人吃不饱,买不起强制要求购买的校服。为此,我们进行了焦点小组调查。当地人告诉我们,确实,校服太贵了,而且不提供校餐。于是我们设计了新的政策。很久以后,我去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个镇区生活,那里有一所很好的学校,但当地人都不去。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没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这个事很复杂,但重点是,这件事让我意识到,我需要找到能把真实生活与权力结构联系起来的方法,把新的信息传递出去,把不同的故事讲出来。这就是我开始介入设计的初衷。

AR: 你曾经把社会企业Participle当作原型实验室进行实践性实验,而且经营了十年,你是怎么把设计融入其中的?

HC: 黑人女权主义者奥德里·罗德 (Audre Lorde) 曾说过,“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子。”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工作方式,而设计提供了三个方面的优势。首先,鉴于今天所面临的社会挑战的复杂性,我们需要跨学科团队合作,这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我们需要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合作,需要经济学家,需要社会科学家,等等。但我们还需要找到一种方式,让生活经历成为这些对话的一部分,不压制其他声音,也不让特定力量占据主导。设计提供了一个载体,它是一种将大

家聚集在一起的世界语,这样我们就可以设计一些新的东西。这是其一。其二,我偏向可视化的工作方法。我认为,使用视觉工具和技术,无论是简单的图画还是视频,能帮助我们讨论那些用其他方式很难谈论的事情。而大多数与福利、与需要帮助有关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难以启齿或棘手的。所以,我们可以融入不同的故事,最终得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其三,设计是与技术紧密结合的。正是技术让我所做的一切成为可能。在Participle,我们用简单的技术,比如廉价的手机和平台,来颠覆商业模式。Participle的一个宗旨是,要做那些越多人使用就越强大的设计,而不是把使用者剔除在外的设计。是技术让这一切成为可能。

AR: 说说你的新项目,以及第五次社会革命。

HC: 这是一份社会变革宣言,呼吁人们思考社会问题、经济和政治制度以及气候危机之间的关联。我们将三者结合在一起思考,思考它们之间的联系。我在疫情之前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显然,它现在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结构性不平等,疫情的传播也与气候危机有关,一些政治制度可以在这样的危机中发挥巨大作用,帮助人民度过危机,而另一些则不能。

AR: 这个项目采用什么方法进行? 它听上去是个极其宏大的项目,不过这一点确实从来也吓不倒你。

HC: 它主要包含相互联系的两部分。一个是思考的部分,我一直在思考并和很多人合作。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被称为“第五次社会革命”,是因为它与我们正在经历的第五次技术革命紧密相关。我深入借鉴了杰出的经济学家卡洛塔·佩雷斯 (Carlota Perez) 的研究成果,她一直在研究技术革命,以及

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表现方式。借用她的理论框架,我们正处于第五次技术革命中,我会思考同胞式的社会体系会是什么样的。

然后是实用的部分。重新设计某些领域真的很重要,比如工作、照护和学习。我的第一个项目是重新构想未来的工作,期间与来自不同背景的群体共同探索这些想法,比如照护人员、掘墓人、核武器制造者、数字企业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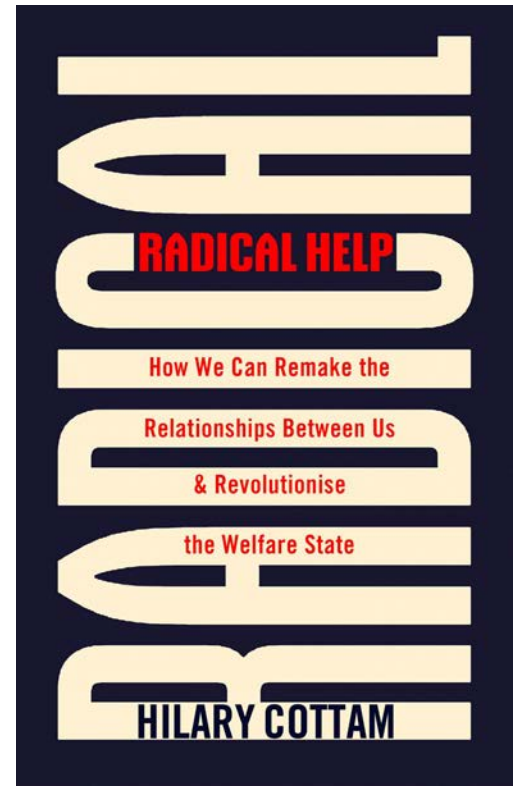
AR: 做了这么多的研究,你现在对未来的方向是否有了清晰的认识? 还是说会继续一边研究一边制定方向?

HC: 我一直在学习,想法一直在迭代。有一组想法已经进入实践,会有不同的结果。最近伦敦大学学院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发表了我的一篇关于第五次社会革命的论文,我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准则的想法。你可以说它是一种设计模式:能支撑这场革命五个准则是什么?它们要能够在任何地方被采纳、使用和重塑。不能像上一次,也就是20世纪中叶那样,只画个蓝图——大规模的工业福利制度就是在那时候出台,一直传到今天的。

AR: 相比你在Participle那种基于社区的实验,技术在这个项目中的作用有何不同?

HC: 《激进扶助》里的实验和在Participle的实验重点关注英国。我当时主要在关注英国的福利制度。我现在也仍然是深扎在英国社区里,但通过人们对《激进扶助》的反应,我意识到,整个西方民主国家都被某些思维方式主导着。而且,通过殖民,我们也已经把这些思维方式输出到了南半球。那么我们要如何重新思考?

技术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改变了一切。它改变了我们的常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模式、我们为人父母的方式、我们的睡眠方式、我们的工作方式。一切都在转变过程中。在这场疫情中,人们清楚地看到有必要重新思考资本主义。有非常强烈的反思资本主义的呼声,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一种社区形式。社会革命背后的想法之一就是把它重新联系在一起,同时思考在新的工作方式和新的系统方面,技术能带来怎样的可能性。我指的不是比如说如何开发一个好的医疗应用程序,而是在21世纪如何创造并支持健康。这样思考的时候,



希拉里·柯特姆,《激进扶助:我们如何重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革新福利国家》,2018年,Virago出版社出版

你就会意识到,把钱投入到20世纪50年代的大众工业医疗体系中不是办法。

AR: 疫情间的封锁带来了痛苦、挑战和矛盾,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反思的时刻。你是否相信这些反思将带来积极的结果,催化你所倡导的大规模变革?

HC: 疫情还未结束,所以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一件事我认为非常非常重要,那就是新关系的涌现。我们走到了一起,互相帮助,有可能是一起制造口罩,也有可能是靠在围栏上聊几句家常。这种情况发生在本地、小范围时,效果更好。我们得以重新认识彼此,建立起新的关系。将来我们不会忘记共同的参与体验,也不会忘记已经了解了我们的邻居。不是说我期望所有疫情期间在英国和其他地方蓬勃发展的互助团体在疫情后也能持续下去,但我认为,这种体验会像二战时那样持续下去。当时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不同阶级的人都聚集在一起,这是战时体验的根本。

中上层阶级尤其需要认识到，贫穷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因为结构上的限制。这会促使我们对社会进行深刻反思，思考社会需要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经验。

我们还可以谈谈与宣言中的社会准则有关的其他事情：我们的制造、修理和再制造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无论是为一线卫生工作者生产防护服还是烘焙面包——就我个人而言，是种了大量生菜。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第五次社会革命会在所有地方被制造、被重塑，事物将被共享，学习也将被共享。但它不会是被大规模制造，然后在某条垂直生产线上移动。在这次疫情中，我们已经看到太多那样的情况。

AR: 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你提到的社区扶助网络在世界各地都有强有力的历史先例。比如在面临严峻感染升级问题的印度，如果没有妇女自助团体在当地社区的

工作，情况会更糟。这些团体最早诞生于1918年孟买流感疫情期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班牙流感，当时社区支持团体为人们提供食物，照顾病患和弱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她们再次发挥了作用。

HC: 我很赞赏她们的做法。技术革命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用新的方式重塑旧的想法。我们看到，人们对合作社和公共事物重新燃起兴趣。例如，已故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关于公共事物的研究理论与新经济思维联系在一起，这令人兴奋。我认为，重新拾起并解读已有的一些思想会带来乐观的结果。不过当然还需要其他的结构性的变化，需要通过设计和努力来实现。这就是挑战。

AR: 要如何通过设计来实现？

HC: 首先，纵观历史，每一次深刻的社会转型（我称之为革命，因为它是一种范式的改变，是绝对的破与立的过程）都需要四组行动者。第一组我称之为有机知识分子。我在这里指的是葛兰西理论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指大学里的学者，而是那些有大思想的人，而且这些思想可以与实践、与心灵和头脑联系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讲不同的故事，讲可能性。

第二组是有组织的公民社会，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可以是劳工运动、工会，也可以是社会运动，比如“黑人的命也是命”和“反抗灭绝”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三组有时会被社会活动家忽视。我称他们为新实业家。回顾历史，你会发现有一点始终很关键：有一群商业领袖，通常是处于新技术前沿的大企业领袖，出于经济原因而非慈善原因，他们认识到，如果不转变商业模式，他们就无法发展。亨利·福特是上一次革命的典型例子。他意识到，如果不给工人多发工资，他的汽车就没有市场。所以，他要求（事实上他把董事会告上了法庭）给工人涨工资。亨利·福特并不是个多好的人，你肯定知道，他还枪杀了他的工人呢。但重点在于，他明白为什么必须改变模式。我目前的一项工作是与技术企业的领导进行一系列对话，探讨他们的角色，不仅仅是在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整个供应链关系方面（虽然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还要更广泛地讨论新的社会契约是什么。

第四组是国家，很明显，国家是制定框架的总园丁，这是实施社会准则所需要的。我写的很多东西都是合作性的，不仅是我自己做梦想出来的。但如果国家不发声，说这是发展的方向，这是投资的方向，像二战后那样，那么要真正转变系统会极其困难。当然，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规模生产的状态，等级森严，垂直分层，它本身需要一场革命，才能进而推动这个过程。一些国家，比如新西兰，正在非常激进地思考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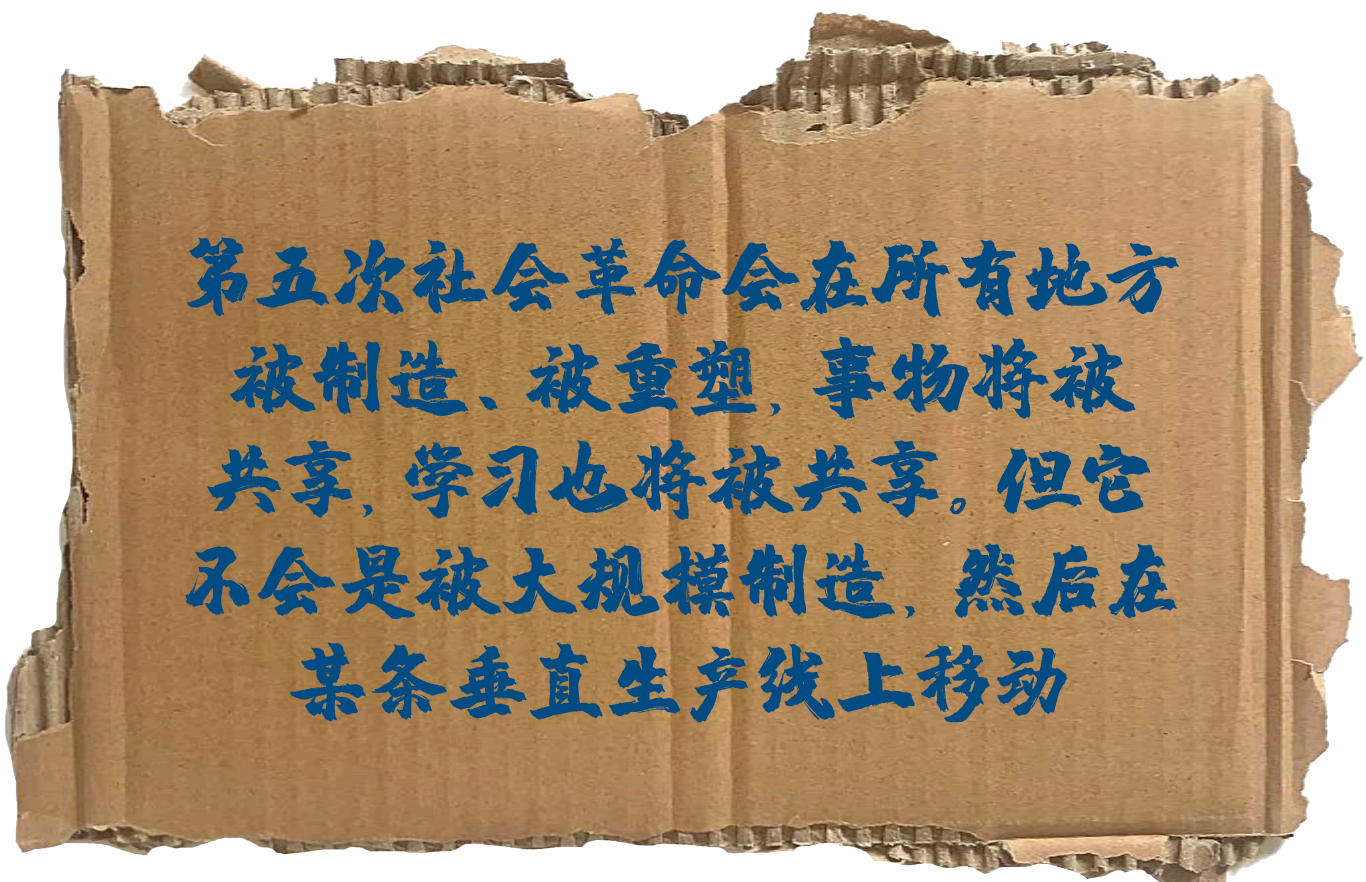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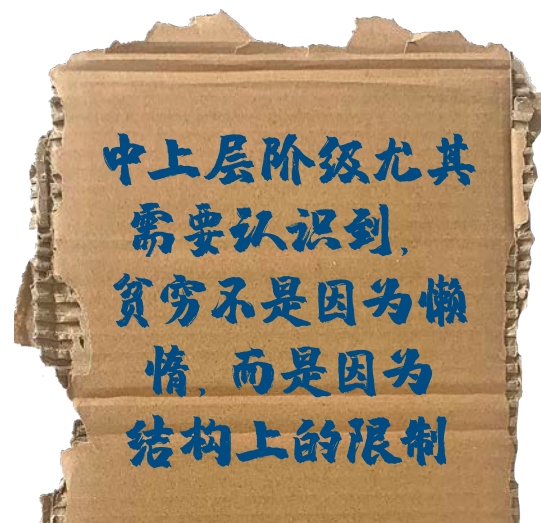
题。遗憾的是，在英国，我们看到大量的国家资金在流动，却不知道需要怎样的转型才能构建一个更公正的社会，以及更有效地应对气候危机。

AR: 确实如此。我想再谈谈第三组人，新实业家。你有无证据表明这群人的态度和动机发生了变化？你把亨利·福特描述成一个善于求变的恶棍，他决定给工人发更多工资是出于赤裸裸的经济利益考虑，而不是出于譬如说凯恩斯主义的信仰，认为通过让社会更繁荣，就可以让它更公平、更公正、教育程度更高、更有效率。你认为今天的新实业家，比如说比尔·盖茨，背后的动机仍然是经济上的私利呢，还是对慈善事业和至善社会的深层追求？

HC: 我不想诋毁伟大的比尔·盖茨，但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模式。我对那些赚了很多钱，然后成为慈善家的人不感兴趣。不是说不需要他们的钱，而是说一个公正的社会不是这样运作的。

先采用一种形式的经济，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后试图找到一种创可贴式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行不通的。真正行得通的，这也是第五次社会革命的主旨，是将经济与社会重新联系起来，重新思考经济的目的。如果我们认为经济的目的用人去创造GDP，不断增长财富，那么我们会总是迫切需要某种贴膏药方案，而且大多数人是无法蓬勃发展的。如果经济的目的是为人类和自然的繁荣创造条件，那我们就会有非常不同的思考。

问题是，那些彻底反思自己作为资本家的角色，而不是“先致富再回馈”的新实业家在哪里？我们要如何重新思考经济？我正在就此展开一系列的对话。在今天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我与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 (Satya Nadella) 和万事达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彭安杰 (Ajay Singh Banga) 进行了对话。看他们能走多远、差距在哪里，是件很有意思的事。丽贝卡·索尔尼特



我们将亲手设计和
实施这场革命，并成
为其中的一份子。
这就是权力的转变，
以及设计故事中的
转变，这就是第五次
社会革命的核心

(Rebecca Solnit) 曾写过关于私有化内核的文字，现在很多人很难将其视为集体的努力，而不仅仅是公司的努力或伟大领袖的努力。事实上它要广博得多。

AR: 你生动而准确地描述了你的愿景，实现这一愿景主要有哪些障碍？

HC: 有很多障碍。这分为两个半场。一方面，目前已经有很多非凡的实践，我从中得到启发，无论是在巴罗因福内斯还是在维甘，又或者在东艾尔郡。但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国家过度集权，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利用中央权力去真正考虑宏观投资和绿色转型，但也不愿意让出社会权力让公民自己找到发展方式。这才是最大的挑战。

我视觉化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有极其强大的、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系统。第五次社会革命就是要颠覆它，代之以真正强大的菌丝状网络，一个水平系统。挑战在于如何实施。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在英国的地方政府里以及世界各地的不同地方出现，比如你提到的印度，通常都是必然性使然。但如何开始转变思维去思考水平系统，而不是以这种垂直的方式修补，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

AR: 一旦成功了社会将是什么模样？

HC: 成功有不同的层次。成功是我们自身可以蓬勃发展，我们周围也欣欣向荣。现在看不到这样的情景。在疫情封锁期间，我们设法让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不至于流落街头，但四下观望，我们看到的是人类的浪费，而不是人类的繁荣和互助成长。这是其一。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成功是与大自然建立联系，自然繁荣，地球也繁荣。然后，我们将重新调整经济，以支持人类和地球的繁荣。我认为，最终，我们将撰写新的故事，将实现转型，将解决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但与上一次革命不同的是，我们将成为革命的实施者，而不是承受者。我们将亲手设计和实施这场革命，并成为其中的一份子。这就是权力的转变，以及设计故事中的转变，这就是第五次社会革命的核心。■

采访全文发表在2020年10月号的《Wallpaper*》杂志上。该期杂志由爱丽丝·劳瑟恩 (Alice Rowsthorn) 和葆拉·安东内利 (Paola Antonelli) 主持的 Design Emergency 计划担任客座编辑。



何以安家

茱莉亚·阿尔巴尼 (Julia Albani)
加拿大建筑中心

通过建筑，我们可以解读和重新定义当前世界及我们生活工作的社会。加拿大建筑中心 (CCA) 的所有展览、书籍、研究及公共项目均以此为前提延伸而来。所以，想要通过建筑解读世界，首先需要知道我们追寻的是什么。

在纪录短片《何以安家》(What It Takes to Make a Home) (2019年, 29分钟) 中, 我们细致探究了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 尝试就建筑如何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 如何重塑当今都市生活提供全新视角。这部短片是一部三集系列片中的第一集, 通过这个系列片, 我们探索了孤独、迁移、隔离和老龄化这些互相交织的社会现状。在每一集中, 我们观察了几个选定建筑项目, 既有全球视野, 也着眼于当地生活方式和人口组成受到的特定影响, 以及这些建筑项目对都市社会及其空间构型形成的挑战。

第一集:《何以安家》

本片并非要调研针对无家可归和住房问题的建筑方案, 而是介绍了两位在实践中直面上述问题的建筑师的态度。这两位建筑师分别是洛杉矶的迈克尔·马赞 (Michael Maltzan) 和维也纳的亚历山大·哈格纳 (Alexander Hagner)。影片将两人的对话与曾经及目前无家可归者的视角交织起来, 为这些人留出空间, 得以呈现他们日常面临的挑战以及更广泛的经历。

“家是个复杂的概念。我发自内心地觉得, 身处社区中, 待在让我感觉安全的人身边才能找到慰藉。四面围起的空间从未让我感到安全。在我看来, 一个四方盒子比起家, 更像一个施暴场所, 一个不宜久留之地。因此, 我不得不学会接受所谓家就是从一个空间移动到另一个空间。”

——服务机构Safe Parking Los Angeles生活技能协调员凯文·雷西诺斯

通过维也纳和洛杉矶的并行叙事, 本片将问题的复杂性逐层展开。无家可归问题既是我们所熟悉的, 也有我们意想不到的一面。在尝试解决问题时, 不仅要考虑空间要求, 人们的情感需求也不可忽视。在指向可负担住房的短缺这一全球性问题时, 影片探讨了建筑在住房困难群体去污名化和树立家的概念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

在哈格纳看来, 专为社会某一特定人群设计建筑无异于强调差异和进一步污名化。他在维也纳打造的VinziRast-mittendrin住房项目就巧妙融入了城市肌理, 让学生和其他无家可归的个体获得一处共同居住的新家, 提供了新形式社区的样本, 独具特色。

马赞则认为, 与众不同的建筑能够赋予专为弱势个体设计的空间以价值。在洛杉矶开发商和物业



短片里的迈克尔·马赞 © CCA



洛杉矶星星公寓, 短片剧照 © CCA



短片里的亚历山大·哈格纳 © CCA



维也纳VinziRast项目, 短片剧照 © CCA

管理机构Skid Row Housing Trust的支持下, 他在当地开展了数个建筑项目, 其中之一就是影片中展示的星星公寓 (Star Apartments)。这是一个多用途综合体, 为居无定所者提供了102套公寓。在马赞看来, 开发多种模式的标志性住房能够吸引到必要关注, 进而推动城市切实有效地解决住房问题。

马赞和哈格纳均寻求以长期战略, 而非临时解决方案来应对住房问题。本片亦对比展示了建筑师可做的实质性工作和无法仅通过建筑解决的问题。

本片已在全世界数个电影节和机构放映,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8届会议上也放映了该片。本片现已在cca.qc.ca/tomakeahome发布。

系列片其他两集预计今年夏天上映的《独居故事》(When We Live Alone) (2020年, 27分钟) 探索了现代都市中人们的独居方式。都市独居人口数量的空前高涨对“家”的常规概念形成挑战, 让人们不禁疑惑这对整个城市形态将造成何种影响。独居现象的成因较为明确, 有社会价值观的转变、用工灵活化、财富增长、传统性别角色的转变等。然而, 独居现象对社会及社会空间构型的影响仍不甚明确。本片审视了这种新型都市状态, 让观众得以瞥见独居者的生活和延伸家庭关系。在两位都市独居者——建筑师高桥一平和社会学家南后由和的带领下, 我们在东京各种独居空间中穿梭。如果独居已然成为全新现实, 影片旨在为观众展现这种现实。

-提及建筑和无家可归,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收容所。-没错。

-收容所这概念不错, 让人可以有一天或一礼拜不用睡大街。但问题是, 这些人总有一天还得去睡大街。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拿出来好好探讨一番: 我们是为某个特殊群体设计住所, 还是真正想要做出让这些群体以某种方式融入城市的东西?

-是的, 确实有这个污名化的问题。我不想在设计中体现这种污名化。我不喜欢为特定社会群体做个什么特别建筑。真不喜欢。我想要在设计中摒弃这种特殊化, 让污名化没有立足之地。有人批评说我们这是在拿人做实验。让学生和无家可归者住一起? 但我们不是在标新立异, 而是想要通过设计构筑一份和睦共处的归属感。

-我常听到的一种批评是, 给无家可归者造的房子干吗要这么漂亮?我想传达的关键信息是, 美感出众的建筑可以作为一种表达工具, 告诉世人无家可归并非难以启齿之事。建筑凭借美感发起对话, 这就是建筑的沟通方式。该建筑的住户也是这个城市的居民, 该群体因此获得了真正的品质和价值。

——迈克尔·马赞和亚历山大·哈格纳的对话



该系列的第三集也是最后一部短片将在2022年上映,该片探讨当今社会面临的又一挑战:老龄化。三部影片的剖析思路与我们为期一年的研究项目“追赶生活”(Catching Up With Life)(2021—2022年)一致。我们通过该项目探索新的行为、习惯和价值观及其对空间的影响,借此促使有关方通过城市和建筑干预,来适应、影响新型居住状态,有时甚至可以适当提前干预。

该系列短片由自2020年起担任CCA馆长的建筑师、编辑和策展人乔瓦那·博拉西(Giovanna Borasi)构思,担任导演的丹尼尔·施瓦茨(Daniel Schwartz)是一位电影人和艺术家,其作品从空间、社会和政治角度关注城市的转型。在CCA,纪录片作为一种策展工具,已经开始发挥关键作用,助力我们触达全球各地的观众,并围绕当今社会的基本问题展开对话。■

加拿大建筑中心(CCA)是一家国际研究机构和博物馆,相信建筑应受到公众关注。CCA策划各种展览,发行刊物,开发和分享藏品资源,推进研究,推出公共项目,基于对建筑如何塑造及可能重塑当代生活的好奇举办一系列相关活动。CCA由菲莉斯·兰伯特(Phyllis Lambert)在1979年成立,现任馆长是乔瓦那·博拉西。

cca.qc.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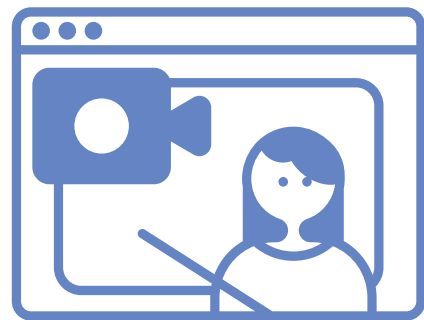


在城市生活却无家可归意味着什么? 在解决无住所问题方面,建筑师能发挥什么作用? 如何让城市成为所有人的美好家园?

When we live alone, 2020



印尼技术和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加速了教育和培训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印尼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中心 (Balai Latihan Kerja, BLK) 的教师们感受深切。

得益于2020年国际劳工组织与印尼人力部和技术教育平台Skilvul合办的培训，180位BLK教师在当地引领数字化转型，其中包括现年38岁的伊尔玛·阿德亚特尼 (Irma Adyatni) 和威维克·哈因 (Wiwiek Haygin)。

阿德亚特尼在加里曼丹南部塔巴隆县的BLK Tanjung担任教师，向两个班的32名学生传授当地食品加工的知识：使用黄南瓜制作面包和使用橡胶籽加工印尼豆豉。在培训过程中，她使用“谷歌教室” (Google Classroom) 应用中的材料；在测验时，她使用Quizzizz应用中的游戏化方法，使测试更具挑战性和趣味性。她说，相比纸笔考试，学生们更喜欢在线考试。

哈因是BLK Pekalongan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教师。她的BLK教学仍然在线下进行，但她参加了国际劳工组织的培训并制作了教学视频，已经开始把视频作为线上辅助教学资料提供给学生，而且开始使用“谷歌表单” (Google Form) 应用进行测验。

不过，由于其所在地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不足，数字化仍然面临很大障碍：由于没有可用的互联网网络，教师们经常不得不使用自己手机的WIFI热点。

尽管如此，相距1450公里的阿德亚特尼和哈因仍决心在各自的教学中心内推进数字化转型，并计划创建一个学习管理系统，以进一步强化数字化转型。

例如，在短期内，阿德亚特尼打算将有关农产品加工的培训材料上载到云端，以便学生或其他教员访问。从长远来看，她计划使用增强现实技术在课堂上解释食品安全。

“增强现实技术的使用可以简化和优化学生对培训材料的理解。例如，使用增强现实技术讲解房间卫生主题，能让学生肉眼观察到有害微生物，从而帮助他们了解并实施适当的清洁措施。”在美国获得了硕士学位的阿德亚特尼对雅加达国际劳工组织分部如是说。

“在线培训不仅是疫情期间的应急响应，也是BLK培训的未来，”阿德亚特尼说。哈因补充道：“在线培训将增加学生接受培训的机会，提升BLK培训的能力。”

数字化的另一个现存障碍是，印尼人力部尚未针对在线和混合学习做出技术指导。对此，人力部培训和生产力发展总局教师与培训人员主任法西亚 (Fauziah) 向国际劳工组织回应称，目前人力部正在编制技术指南，将作为未来教师的职业标杆，为实施有效的数字化培训提供指导。

这将有望进一步加快印尼数字化培训转型，特别是在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能够鼓励全国各地更广泛的参与。

该培训计划由国际劳工组织通过“女性STEM劳动力准备和发展计划” (Women in STEM Workforce Readiness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 实施。该计划由摩根大通基金会资助，旨在为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女性提供与STEM、就业能力和领导力有关的非技术和技术技能培训。■

增强现实技术的使用可以简化和优化学生对培训材料的理解

健康故事： 两位医生为巴基斯坦设计的远程医疗服务

专访萨拉·赛义德·库拉姆和伊法特·扎法尔·阿加
采访：爱丽丝·劳斯瑟恩

巴基斯坦有两亿人口，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有条件就医。两位巴基斯坦医生——萨拉·赛义德·库拉姆 (Sara Saeed Khurram) 和伊法特·扎法尔·阿加 (Iffat Zafar Aga) 决定解决这个问题。她们设计了一项名为“Sehat Kahani”的远程医疗服务，通过这项服务，那些和她们二人一样为了照顾家庭而放弃执业的女医生就可以在家工作，通过实时视频链接或应用程序来诊疗病患。Sehat Kahani在乌尔都语中意为“健康故事”，它于三年前创立，目前在巴基斯坦各地运营。两位创始人告诉爱丽丝·劳斯瑟恩，项目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已经得到了公众认知和政府支持。未来，项目将加快发展，作为远程医疗的一个积极案例，为迫切需要改善医疗服务的国家提供帮助。

AR: 你们为什么要创立Sehat Kahani?

SSK: 它主要解决两个有关健康的问题。第一个与我和伊法特的生活息息相关，也就是医生的权利问题。巴基斯坦共有17万名医生，其中女医生约占60%至70%。这是件好事，但遗憾的是，目前只有23%的女医生在巴基斯坦医疗及牙科委员会注册并工作，这意味着全国有七八万名医生根本没在健康医疗的生态系统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医生新娘”——巴基斯坦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医生，但这不是为了让她们作为医生为社会服务，而是为了让她们在结婚后照顾家人。在巴基斯坦，女性如果是一名医生，又高挑漂亮，那么在包办婚姻市场上会非常抢手。

第二个问题非常让人痛心——在这个国家，病患很难获得医疗服务。一半以上的人得不到正规医生的帮助，只能求助于江湖医生、信仰治疗师、助产士或护士。虽然医疗基础设施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但我们认为，我们的医生队伍无法充分发挥其潜力，是巴基斯坦大多数人无法获得医疗服务的重要原因。

我和伊法特都经历过“医生新娘”的问题。我生下女儿后得了产后抑郁，无法工作。伊法特因早产失去了孩子，也离开了工作岗位。再怀孕的时候，她很担心会再次失去孩子。我们就觉得，巴基斯坦有很多女医生都经历过这些创伤，我们可以帮助她们，为她们提供在家执业的机会，利用远程医疗技术让无法就医的患者接受治疗。于是就有了 Sehat Kahani。

AR: 创立三年以来，你们遇到了哪些困难？

IZA: 有很多挑战。我们一开始提出这个概念时，有些人就说它行不通。远程医疗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进入巴基斯坦，但那些项目大多是捐助的。人们是否愿意为远程医疗付费，系统如何运作，患者能否信任网上的医生，这些都是问题。

当我们开始接触合适的社区群体时，需要进行大量的宣传教育，让人们相信他们会从这个项目中受益。在早期，我们会和社区的妇女坐下来，向她们解释这项服务，告诉她们医生们都住在城里，都是从知名医院里出来的。这些都是挑战，但假以时日，我们克服了困难，一路上也获益良多。

AR: 运营一个全是女性的医生团队有困难吗？

SSK: 有，因为巴基斯坦仍然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国家，很多人仍然认为女性有很多事做不了。但有一点对我们有利，那就是在巴基斯坦，医生被认为是个崇高的职业。虽然很多女性患者不愿意看男医生，但男性患者对女医生就没有这样的顾虑，因为他们尊重这个职业。

我们创办 Sehat Kahani 的初衷是在低收入社区建立远程医疗诊所。这些社区大多重男轻女，所有事都由男性来作主。我们刚开始开设诊所时，由护士作为中间人，帮助患者与女医生联系。这样做的好处是，当妇女和儿童进来时，她们会看到为患者提供咨询的是女护士和女医生。所以，在这些诊

所中，男性的参与十分有限。随着 Sehat Kahani 的发展，为适应大众市场，我们又开发了应用程序。有趣的是，使用手机程序的有70%是男性患者，他们向女医生咨询病情，并没有什么不满意。确实有些问题，比如性问题、泌尿系统问题、心理问题，需要男医生来解决，所以我们也专门聘请了男医生。但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男性患者咨询女医生，无论为自己还是为家人，都比看男医生更自在。

AR: 在 Sehat Kahani 的发展过程中，设计起到了哪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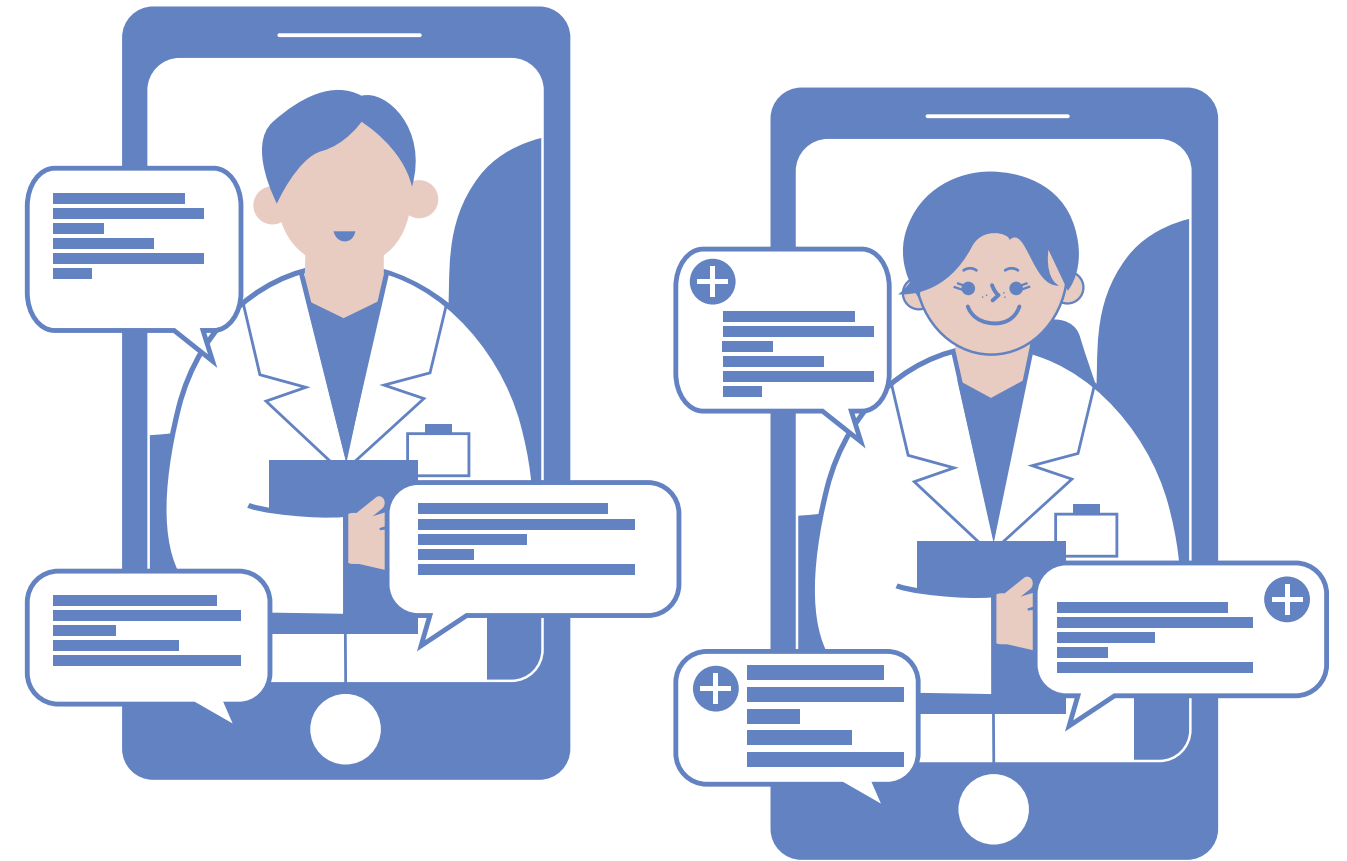
SSK: 设计一直是我们的开发每一项服务、每一个产品的重要环节。我们非常幸运地参加了很多计划，从中学会了如何设计。例如 Spring Accelerator 计划，该计划支持那些承诺用产品和服务去改善青少年生活的企业。Spring Accelerator 在我们的社区开展了外部研究，以了解患者期望从一站式诊所中获得什么样的医疗服务。这些调查让我们了解到，女性不仅希望获得全科医生的建议，也希望在同一个地点能获得尽可能多的医疗服务。因此，我们的社区诊所现在也会在指定日期提供超声波专家服务。

我们还了解到，在巴基斯坦，无论是低收入社群还是高收入社群，都面临着心理健康的问题。虽然问题是一样的，但它在这些社群里的表现方式却大相径庭。通过不同的设计方法，我们能够不断改进服务，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AR: Sehat Kahani 如何应对巴基斯坦的疫情危机？

SSK: 疫情暴发时，我们很担心，因为巴基斯坦的医疗体系脆弱，很难应对这种额外的压力。医院挤满了新冠肺炎患者，那些无法出门的患者要怎么办？那些需要帮助但又不能去医院的妇女、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又要怎么办？

公司内部面临的情形是：原本的运营地点——那些远程医疗诊所，因为封锁不得不关闭；我们有一个新应用，才上线半年，每天大约有15到20名患者在使用；还有一个企业医疗解决方案，有六七家企业在使用。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灵活求变，利用这个机会为很多人提供医疗服务；二是坐等远程医疗诊所重新开放。我们选择了前者，把所有精力都



投入到远程医疗应用上，尽力确保在线医生随时为患者提供咨询。我们为企业用户提供高补贴套餐，为个体患者则实行免费。通过与巴基斯坦联邦政府、各省政府、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我们争取为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提供医疗服务。

我们的服务尽可能向外延展，使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Sehat Kahani 应用程序联系到医生。应用程序的用户量从每天12到15名患者，变成了每天七八百名患者，其中有十分之一是新冠肺炎患者。有一次，一名初产妇凌晨4点分娩，丈夫远在迪拜，她一人在家，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是 Sehat Kahani 的一名医生帮助她到一家三级护理机构分娩。还有一次，一位住在俾路支省的70岁老人，他所在的是巴基斯坦一个非常偏远的地区，医疗条件差，但我们能够从他的症状诊断出他患了心力衰竭。由于封锁和经济危机，应用程序上出现了几名遭遇心理健康危机的患者，我们成功帮助他们。我认

我们有一个1500名医生的网络，他们是一个更大网络的一部分，会介入培训和健康教育。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从这个网络中调动医生

为，这改变了巴基斯坦的数字医疗进程，也改变了 Sehat Kahani 作为一家公司的发展进程。

AR: 你们是怎么调整 Sehat Kahani 的结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聘请更多的医生，快速发展壮大起来的？

IZA: 我们有一个1500名医生的网络，他们是一个更大网络的一部分，会介入培训和健康教育。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从这个网络中调动医生。正如萨拉所解释的那样，当开始接到更多的诊疗咨询时，我们不得不额外动员200名医生在应用程序上工作，甚至一度上面有300到350名医生在工作。他们都接受过核心医疗方案培训，随时准备为患者服务。所以我们才能迅速适应疫情期间的非常状况。

所有新加入 Sehat Kahani 网络的医生都会接受广泛的培训，内容不仅涉及远程医疗，还包括如

何使用软件满足患者的需求。他们都接受过新冠肺炎医疗方案培训，这些方案会根据政府应对方案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在不断升级这些方案，也针对所有通过手机应用可以预判的主要医疗问题做了准备。我们曾遇到过有自杀倾向的患者打电话给全科医生而不是心理健康专家的情况，所以全科医生也需要接受培训，知道要将这些病例转诊给相关专家。

AR: 疫情期间的应对对 Sehat Kahani 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SSK: 疫情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巴基斯坦的技术应用情况极差，远未达到我们希望的标准。我们本认为还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人们才会真正相信技术和远程医疗的力量，但这场疫情让巴基斯坦人看到了技术的价值。我们也越来越容易向企业合作伙伴、政府和利益攸关方传达远程医疗是医疗的未来这一理念。每天都有企业订阅。联邦政府、省政府与一家初创公司合作提供远程医疗服务，这一事实表明，政府也意识到了数字医疗的价值。

在一个资源有限、医疗基础设施落后的国家，远程医疗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巴基斯坦的公共医疗结构和英国很像。患者先到一个初级医疗单位，从那里到二级医疗单位，再到三级医疗单位。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初级医疗单位都改成远程医疗单位，让在线的远程医生而不是护士或助产士为患者看病，会怎么样？这样做可以帮助多少患者解决初级医疗问题？和过去相比，现在我和政府讨论这些问题容易多了。

AR: 接下来你们打算如何发展?

IZA: 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途径。我们的想法是，在今年专注于扩大移动应用服务。目前的重心是在巴基斯坦，但我们在考虑延伸到其他国家。另外还有一个巨大的机会，就是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开发同一应用的不同版本，比如供三级医院使用的版本。还有其他一些医疗领域可以深入。

AR: 远程医疗现在获得了政府支持和公众认知度，你们打算如何利用这些优势来推进工作?

SSK: 我们会和政府协商一项正式的数字医疗政策，或者为国内的数字医疗制定规范或指南。任何服务要合法化，都必须有一个相关政策或指导，但这目前在巴基斯坦是缺失的。我们正在政府、联邦

和省级各级平台上努力呼吁建立这样的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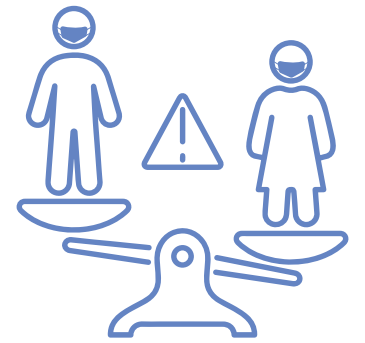
第二，与政府的合作提高了我们的声誉，所以很多医生都想与我们合作，利用我们的移动应用建立线上诊所。我们也在与政府沟通，讨论将初级医疗单位升级为远程医疗单位。目前巴基斯坦有六七千个这样的单位，没有医生、没法接诊；它们可以被升级。当然，这些工作必须先从小型试点开始，如果有前景，再扩大规模。目前，巴基斯坦三分之一的人口有条件就医，我们可以把这个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二。

Sehat Kahani 作为一个远程医疗平台，可以让巴基斯坦的医生帮助其他医疗服务有限的国家，比如孟加拉国，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我们的医生网络和远程医疗平台可以成为更多国家的解决方案。■

sehatkahani.com

这篇采访发表在2020年10月号的《Wallpaper*》杂志上。
该期杂志由爱丽丝·劳斯瑟恩 (Alice Rawsthorn) 和葆拉·安东内利 (Paola Antonelli) 主持的 Design Emergency 计划担任客座编辑。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性别不平等



国际劳工组织2021年3月在越南发布的一份新的研究简报显示，疫情不仅加剧了现有的不平等，而且造成了新的性别鸿沟。

尽管越南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非常高（越南70%以上的劳动年龄女性参加工作，而全球水平为47.2%，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平均水平为43.9%），但越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着多重以及持续的不平等，并承受着不成比例的工作和家庭的双重负担。

研究表明，越南女性的高劳动力参与率不应被解读为机会平等。事实上，高劳动力参与率和低失业率掩盖了女性相对较差的就业质量。

“疫情之前，女性和男性都比较容易获得工作机会，但平均而言，女性的工作质量低于男性。”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劳工组织越南劳工经济学家瓦伦蒂娜·巴库奇 (Valentina Barcucci) 说。

女性劳动者在弱就业——尤其是家政劳动中的比例过高。尽管工作时间相当，教育程度上的性别差距也在逐步消除，但女性的劳动收入仍低于男性（2019年女性平均月工资比男性低13.7%）。

决策性岗位上的女性比例也远低于男性。女性占劳动力的近一半，但在管理岗位上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

“女性在就业质量和职业发展方面与男性的差距，来源于她们被迫承担着双重负担。”巴库奇说，“她们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是男性的两倍。”

疫情不仅加剧了劳动力市场已有的不平等，还造成了新的不平等。2020年第二季度，越南女性工作时间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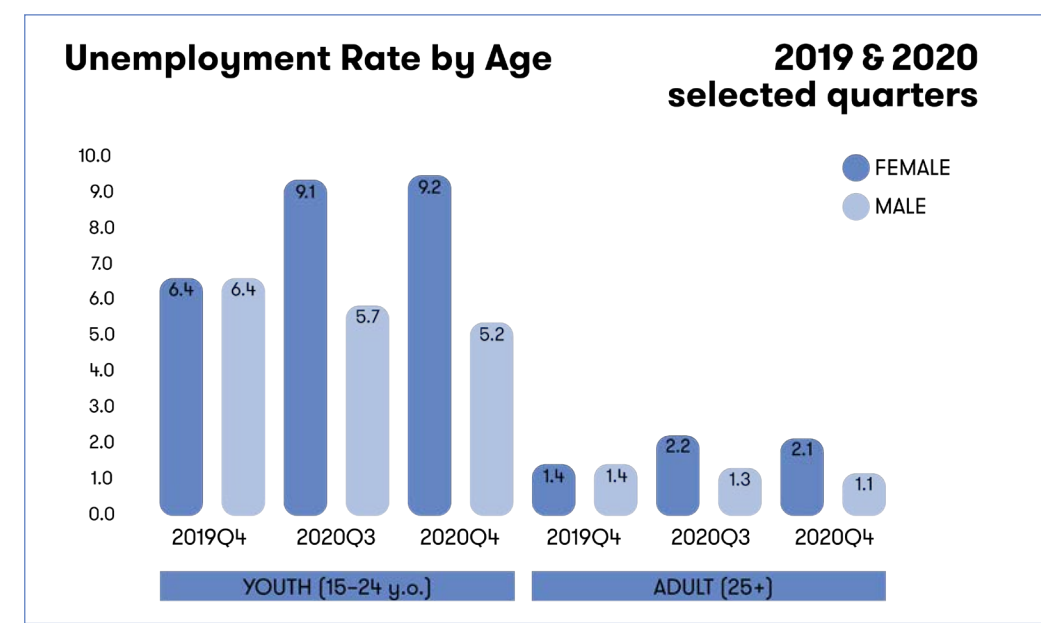
缩减，女性离开劳动力市场的比例高于男性。较年轻和较年轻的女性通常从事着最不稳定的就业，她们更有可能被迫离开劳动力市场。

女性的工作时间恢复得比男性快，但这可能是由于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才能弥补第二季度的收入损失。这些因素表明，疫情可能使女性的双重负担比之前更重。

疫情之前，越南男女失业率没有差别。但从2020年第三季度起，差距开始显现。

“在政策层面，2021年1月1日生效的《2019年劳动法典》为缩小性别差距带来了机会。例如，政策对退休年龄做了规定，取消了对女性从事某些职业的禁令。尽管如此，越南仍有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需要改变越南男性和女性自身的心态，这样才能影响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行为。”国际劳工组织驻越南首席代表李昌徽 (Chang-Hee Lee) 说。

《越南2021—2030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在公民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缩小性别差距。要实现这一目标，越南需要真正开始直面并消除传统上的性别不平等。■



LUA卫生巾项目： 通过减少废物和推动性别平等来应对经期贫困

安娜·奥兰多

LUA卫生巾项目通过设计、原型制作、生产和捐赠可重复清洗的卫生巾来减少废弃物，同时推动性别平等。

在全球范围内，每天有超过8亿名女性来月经，其中至少有5亿人缺乏足够的资源——包括卫生用品、教育和设施——以管理她们的月经。

社会和文化偏见导致的现实后果非常惊人：在世界各地，女孩经常逃学或弃学，因为她们在月经期间不能上学；在最贫穷的国家，只有不到一半的学校和公共场所所有可用的厕所，其中又仅一半有自来水，这意味着没有合适的地方和垃圾箱来更换卫生巾。缺乏厕所还加剧了一个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的关于卫生问题的误解，认为月经期间洗澡会导致各种疾病和不孕。很多女性缺乏关于月经的教育，在第一次月经来潮时会认为自己患了疾病。其他不容忽视的问题还包括为购买卫生用品等而进行性交易，以及在尼泊尔等国家，不准经期女性回家等习俗。

这些根深蒂固的耻辱感使月经成为一个让人避讳的话题，加上女性在健康和安全方面的脆弱性，更加剧了女性的贫困状况，让她们生活缺少出路。

Lua卫生巾项目的目标是解决经期贫困和经期健康管理问题，同时提高那些能够获得经期用品和设施的女性对此类问题的认识，并在社会各阶层减少一次性卫生巾所产生的废物。

项目第一个目标选择在了菲律宾，特别是棉兰老岛上芒扬少数民族和巴拉望一个部落的土著女

性。芒扬人多生活在偏远山区，以狩猎和采集为生。通过在村庄里进行访谈和对当地情况进行研究，我们发现，在这里，月经总是伴随着耻辱和不洁。关于月经的迷信有：被经期女性碰过的蔬菜会腐烂；男人如果膝盖碰到经期女性的腿的话就会秃头；整个经期都不准洗澡。经期女性只能待在家，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很不舒服，因为即便穿了两条甚至更多条裤子也没法保护自己。整个星期，她们都不做家务，让男人来照顾家庭。

由于经济匮乏且地理位置偏远，这里的女性大多使用临时材料，如树叶、米袋和织物碎屑来吸收经血。一些女性买得起塑料卫生巾，但经常一片卫生巾就用24小时。这两种方法都会引起感染和不适。后者没有像当地大多数塑料那样被烧掉，而是由于月经禁忌而被埋在森林的地下，造成对土地和地下水的污染。

此外，家里的男性负责管理购买月经用品的钱，并强迫妇女和女孩在月经期间不得接触水、种菜和卖菜。许多妇女和女孩承认，为了让生活正常进行，她们会隐瞒月经。

LUA可重复清洗卫生巾是为所有有需要的女性提供的实用解决方案。原型制作阶段试验过从防漏雨伞材料到旧棉质T恤的各种材料，并根据村里的妇女和女孩们的反馈意见不断改进。

减少经期废弃物有助于环境的可持续性，在废弃物管理方面提升到新的层次：平均而言，一名女性一生中会使用16000片卫生巾，大约相当于150公斤的塑料。



LUA项目的核心是进一步推动社会的可持续性，通过与村里的妇女和女孩们沟通交流，提高她们的认识，减少经期贫困，帮助她们获得体面的经期用品，并加强经期健康管理。

该项目已经得到负责保护菲律宾原住民权利的政府机构——菲律宾国家原住民署(NCIP)的批准。NCIP认为项目捐赠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LUA目前已经在菲律宾和哥伦比亚开展，长期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向有能力支付费用的女性销售可重复清洗的卫生巾用品，并利用所得收益生产经期用品，捐赠给有需要的女性。■

LuaPad项目由意大利建筑师和建筑工程师Anna Orlando和哥伦比亚政治学博士Cindy Suaza发起，并得到波多格尼拉本地人Melody Ledesma的大力支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该项目在棉兰老岛启动。两位发起人在封锁前就住在那里，帮助当地偏远小学实施WASH计划，并在疫情期间协调口罩和食品捐赠事项。

@luapadproject

中国玉目志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

2021年4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对外发布了《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

白皮书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与贫困作斗争，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打赢脱贫攻坚战伟大历程，介绍人类减贫的中国探索和实践，分享中国扶贫、脱贫的经验和做法。白皮书是一部全景式地反映了中国减贫事业发展的重要史料和文献。

白皮书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崭新征程。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中国发展，中国减贫进程加快推进。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减贫进入脱贫攻坚历史新阶段。中共十八大以来，经过8年持续努力，到2020年底，中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中国减贫史乃至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白皮书指出，脱贫攻坚战对中国农村的改变是历史性的、全方位的，是中国农村的又一次伟大革命，有力推动了中国农村整体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历史上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实现了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百年夙愿。

精准扶贫方略，是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中国在脱贫攻坚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做到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精准”，实施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五个一批”，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稳“五个问题”，增强了脱贫攻坚的目标针对性，提升了脱贫攻坚的整体效能。

白皮书强调，精准扶贫方略不仅确保了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而且有力提升了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

中国在减贫实践中探索形成的中国特色减贫道路和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拓展了人类反贫困思路，为人类减贫探索了新路径。白皮书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立足实际推进减贫进程、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等方面，为人类减贫提出了中国建议和中国方案。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减贫合作，做国际减贫事业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贡献者。白皮书指出，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

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愿同各国加强减贫交流合作，携手推进国际减贫进程，为构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

域发展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中国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白皮书描绘了到2035年、2050年中国乡村振兴和中国发展的美好前景，指出未来中国将向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更高目标继续迈进。

白皮书全文共3万余字，除前言、结束语外，共包括五个部分，分别为“中国共产党的庄严承诺”、“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为人类减贫探索新的路径”、“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白皮书全文可见：http://language.chinadaily.com.cn/a/202104/06/WS-606bffe7a31024ad0bab3c43_1.html
(中英双语)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立足实际推进减贫进程、发挥贫困群众主体作用、汇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

设计能为扶贫做什么

汤健
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设计扶贫研究院院长,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城乡协同发展中心主任

设计扶贫研究院总结协会会员多年的专业实践成果,制定出设计扶贫的“十大模式及十大措施”,为全国设计扶贫工作提供指导。

扶贫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国策,它既要求解决当下脱贫的问题,也要求解决产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除了帮助贫困人口增收之外,扶贫工作更核心的是要解决贫困地区区域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发展,以及贫困地区人口综合素质的提升问题。这就要求在产业发展方向上要坚持长期主义,在产品上要坚持品种、品质、品牌、品味、品格的不断提升,还要培育人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创造机会公平的环境,关注自然生态的承载能力。我们需要在阶段性、长期性、落差与平衡、所有与所用、优势与短板、部分与整体、计划与更新之间,找到价值所在以及实现的路径,然后在高效、低耗的运行原则下达成目标。所有这一切都要求设计思维、系统思维与数字化思维。

在此背景下,中国工业设计协会于2018年11月成立了设计扶贫研究院,致力于推动设计产业从工业设计、产业设计到社会化设计的进化。研究院的成立亦是对同年4月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与中国工业设计协会等组织共同发起的《设计扶贫倡议》的响应。《倡议》鼓励国家间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设计扶贫合作,充分发挥独创、道德、情感、美学的设计力量,将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作为共同任务,在经济、社会、环境领域形成良性循环,有效提升产业活力和生命价值,促进繁荣并保护地球,为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做出贡献。

设计扶贫研究院总结协会会员多年的专业实践成果,制定出设计扶贫的“十大模式及十大措施”,为全国设计扶贫工作提供指导。工业设计协会在直接实施设计扶贫工作的广大会员与各地政府的产

业发展需求之间,担当起连接、公共关系协调、支持、赋能和推广的角色,主要工作内容包括:

一、从实践中提炼生产知识、方法和工具,通过组织培训、实地研学等办法传播知识,并推介专业服务商或团队,以匹配各地产品和产业发展的设计需求;

二、为设计扶贫工作中的产品设计和产业设计服务下定义、定流程、定工作标准,甚至于制定公益性项目的取费规则和标准合同版式。提供常态化运行工作平台,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知识管理、专家库、政策查询等,为服务工作建立优胜评价机制,让公益活动和社会化企业走上正规化、体系化道路;

三、根据贫困地区各级政府的具体需求,建立在地公益性的产业创新发展智库,调查并研究区域产业创新发展核心问题。组织专家和企业家研究贫困地区和人口致贫的根本性原因,建立针对地区经济发展共性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建设区域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工程,树立工作模型和学习标杆。

设计扶贫项目成功与否,首要的是看商业上成功与否,能否为贫困地区和人口创造财富。设计创新能够引导商业成功。我个人认为,在自身不够强大时,先跟随、以微创新求生存和改善;成为细分市场龙头时,再勇敢创新、领先半步。这个“半步”指的是半步在现有市场里苦干,另半步要勇敢跨入行业的未知地带,创造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和新产品,满足新场景和新需求。要保持持续发展的动能,就要敢于离开舒适区,制造不平衡,然后在不平衡和再平衡之间螺旋向上,提升产业创新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自成立以来,设计扶贫研究院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针对扶贫地区产业发展需求的调查以及服务资

设计扶贫合作,充分发挥独创、道德、情感、美学的设计力量,将消除一切形式的贫穷作为共同任务

从产品设计到产业设计再到社会化设计,设计在扶贫行动上可以大有作为

本文根据《设计》杂志2020年9月刊对作者的专访内容整理而成,原题为《设计进化从产品设计、产业设计到社会化设计》。

源聚集和匹配的工作。在实践中我们逐步认识到,依靠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设计师的创意力量,依靠供应链整合、新零售渠道的融合,固然可以帮助部分扶贫对口地区的农民或手工业者增加一定的收入,但是距离设计扶贫的最终目标还有差距,这个最终目标是:在产业设计和区域经济发展层面,为当地政府创造新的支柱型产业,真正实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联动融合发展,尽可能把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留在当地,建立区域甚至全国细分市场的产业高地,形成产业发展门槛和可持续发展新动能。

因此,接下来的设计扶贫工作要聚焦在两大核心:田园产业乡建发展和田园产业人才发展。我们不但要做贫困地区政府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智库,还要沉下去,做产业服务平台和产业发展示范区。以工业与信息化部门和中国产业设计力量为核心,尽可能集合地方政府、政府平台公司、中央企业和社会力量,为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而努力。另外,针对地级市特别是县、区以下缺乏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的问题,要与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科技、产业部门共同建立起终身教育和

职业生涯发展模型,努力培养出合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各专业和综合性人才。

在扶贫工作的不同阶段,设计有不同的侧重。在初级阶段,扶贫重点是帮助贫困人口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设计就要在最小资源消耗下寻找次优解,满足基本的功能需求和审美诉求,通过产品设计和市场推广实现产品的比较优势。在第二阶段,扶贫需要解决创新发展、产业系统竞争力的问题,那么就需要产业设计,要设计出产业发展优势系统,实现高效率、低成本、优体验。在第三阶段,扶贫面对的是地区可持续发展、生态化、科学化、数字化发展的问题,就需要设计产业体系全面发展,实现高仿真、现实和虚拟世界的交互设计,模糊自然与人工、现实与虚拟,通过建立社会化设计服务体系,实现经济、智性和精神上的扶贫。我们相信,从产品设计到产业设计再到社会化设计,设计在扶贫行动上可以大有作为。■

设计教育赋能 扶贫攻坚

马牧群
兰州工业学院艺术设计学院院长、教授

兰州工业学院是一所在2012年升格为本科的应用型工院校。身在西部，参与扶贫工作可以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以设计来介入扶贫，我们是从2015年左右开始尝试的。当时学校有一位教授到定西渭源县挂职科技副县长，定西是我国最大的中药材产地，渭源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当地政府就希望能带领农民通过种植中药材来脱贫致富。这位教授就问我能不能给渭源县中药材种植户建一些电商网站。正好我们开了网页设计课，就把这个题目布置给老师和同学们来做。之后我们就开始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做和扶贫有关的设计，比如品牌策划、土特产和农产品包装、乡村旅游画册设计、农村电商网页设计等和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有关的项目。

从学校层面来说，应用型本科强调服务地方经济，强调贡献度，强调不可或缺。作为应用性很强的艺术设计专业，实践环节是必不可少的教学内容，所以设计扶贫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可以深度挖掘的金矿。社会有这个设计需求，我们也需要大量真实项目来磨炼。

除了专业上的优势外，我们参与设计扶贫也有历史、地理以及人才上的优势。甘肃历史文化厚重，民族文化多样，自然景观令人神往。但省内有不少贫困县，其中很多还是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县，比如距离省会兰州100多公里之外的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就是扶贫攻坚工作中的难点。我们身在贫困地区，深知这些地区和人们的需求，因此能很好地沟通，做深度的开发与合作。而且，我们的学生有70%来自农村，大部分学生的家庭都还不富裕，因此他们有改变家乡面貌的强烈的内生动力。

设计扶贫是个系统工程，要提高效率，就要减少中间环节，直接找最基层、最需要设计服务的组织和企业。我们的做法是“主动出击、上门服务”。以兰州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向西，为西固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河口镇文化古街设计旅游文化纪念品及文创产品；向东，为榆中县青城古镇提供



设计公益服务，用建筑动画漫游的形式表现罗家大院、青城书院古建筑的风韵，用3D打印技术研发出用传统建筑榫卯结构拼装的文创益智玩具；向北，为“玫瑰之乡”永登县苦水镇的玫瑰做包装设计；向南，为兰州七里河区的“中国百合之乡”西果园镇做有关百合农产品的包装设计。

学校组建了丝路漆艺文创中心和西部民族文化创意研究中心，专注于“非遗+扶贫”的融合和针对少数民族的扶贫。甘肃东部和南部盛产漆树，年产大漆10万斤以上，我们通过漆画、漆艺技艺的研习和培训，做深、做长大漆产业链，增加文化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设计能够赋予“非遗”新生，让这些优秀的传统技艺能够被活态传承，满足现代社会的审美和功能需求。这些设计介入也让“非遗”传承人

我们相信能够培养出具有如此洞察力的新一代设计师，能始终坚持扶贫设计的公益性，又能保证设计作品的美学、实用和完整性





和民间工艺美术师有机会接触新的信息, 尝试更好的材料。

我们也积极参与了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的“非遗+扶贫”项目, 和兰州交通大学的项目组一起, 为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夏砖雕和保安腰刀做了调研和设计服务。

2019年, 天水市麦积区针对残疾贫困人群举办了赋能培训班, 我们选派老师和学生为他们做了创意工艺品和漆画制作的培训, 希望能帮助残疾人群体拥有一技之长, 克服封闭环境, 增强自信, 融入社会。

2019届的毕业设计, 我们给学生出的题目是为自己家乡的乡村旅游做设计, 从全省14个地州市中遴选出30多个乡村, 最后收获了47组毕业设计, 内容涉及乡村一级的旅游宣传、景区规划、美丽乡村改造、土特产产品包装设计以及文创产品开发等。

参与扶贫对设计专业的师生们来说意义非凡。学生们亲自动手做身边的一些真实案例, 需要脚踏实地地去研究真实的需求和市场, 要把用户思维、产品思维放进设计里, 要面对面和甲方交流切磋。这些都使学生的作品更接地气, 避免了好高骛远、贪大图洋。另一方面, 设计扶贫项目对我们设计专

业的教学改革启发也很大, 比如说我们的毕业设计已经做到完全是真题真做、一人一题, 不容许有假设、虚拟的题目。大量真实案例的植入能够让我们避免闭门造车, 借机努力提高每一门专业课的含金量。在介入的过程中, 我们也在积极和教育部一流本科专业、一流本科课程的要求做衔接, 使我们的教学内容更具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

设计扶贫要求设计师以敏锐的洞察力, 以设计系统为载体, 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 对现有资源进行创造性重组, 从而激活传统资源的开发。它要求通过新观念和新技术的运用, 搭建起新的生产消费系统, 以实现生活方式构建和文化塑造, 激活当地文化的内生动力。我们相信能够培养出具有如此洞察力的新一代设计师, 能始终坚持扶贫设计的公益性, 又能保证设计作品的美学、实用和完整性。我们也期待政、产、学、研、商能够联合发展, 让更多设计扶贫成果顺利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

以实现生活方式构建和文化塑造, 激活当地文化的内生动力

本文根据《设计》杂志2020年9月刊对作者的专访内容整理而成, 原题为《设计是扶贫攻坚系统工程的“协调人”》。

乡村妈妈的电商之路

杨碧琼

在中国的扶贫攻坚战和乡村振兴计划中, 电子商务被当作一个有力的武器。2016年, 电商扶贫被正式纳入中国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和工作体系。几年来, 通过完善贫困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支持平台建设, 整合资源, 加强人才培养, 电商扶贫有力推动了农村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商务部数据显示, 2019年全国贫困县网络零售额达2392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33%, 带动贫困地区500万农民就业增收。农村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农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商贸流通、带动创新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动力。

在通过电子商务就业创业和增收脱贫的进程中, 有一个群体的力量不容小觑, 那就是农村的中年女性。尤其是在中西部省区的农村, 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 导致很多中年女性需要一人承担家庭里照顾老幼的责任。但受当地经济发展方式限制, 这些留守女性通常只能以务农为主, 因此经常陷入经济窘境。

友成基金会的“香橙妈妈大学”项目, 面向的就是那些早年间外出打工、后因家庭责任而返乡的农村中年女性。项目是由友成2017年启动的“让妈妈回家创业”扶贫项目演变而来的, “香橙妈妈”这个昵称既巧用了谐音, 也体现出乡村妈妈给人的温暖形象。

项目从一开始就定位以电商培训为主要模式。在农村发展电子商务, 可以打破中间环节, 将农村与城市市场直接联系起来, 实现双向循环。然而, 近年来, 尽管中国“互联网+”发展迅猛, 但从总体上看, 贫困地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究其原因,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市场化程度低之外, 电商人才稀缺、贫困群众网上交易能力较弱是一大制约。友成的电商培



训项目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先是五天到十天不等的面对面授课, 之后是为期一年的陪伴式辅导, 目的就是要把农村中年女性培养成当地的“电商达人”, 帮助当地和市场联系起来。让乡村妈妈通过电商进行创业或者就业, 在实践过程中遭遇了不少困难。农村女性除了身体上的劳累、经济上的困窘外, 还需要面对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因此, “香橙妈妈大学”项目在电商技能培训之外, 也注重从女性心理、女性领导力等方面, 为乡村妈妈赋能, 帮助乡村妈妈就业和创业, 实现增收, 增强自信, 最终实现自我赋能。

友成基金会也尝试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创意的力量, 让公益力量走得更远。2019年, 友成参与了腾讯“我是创益人”公益广告大赛, 与专业创意和技术团队合作, 推出名为《时光兑换机》的公益作品, 在QQ阅读平台上, 鼓励

用户用自己的阅读时长, 来为更多乡村妈妈兑换教育基金。2020年, 友成又在“我是创益人”大赛平台上推出名为《女排国潮秀 乡村妈妈绣》的公益广告

她们用自己的创意将家乡带到了更多人的眼前, 同时也让自己活出了一个过去不敢想象的新面貌

“香橙妈妈大学” 项目，面向早年间 外出打工、后因家庭 责任而返乡的农村 中年女性



作品，将象征时代精神的热门女排IP与乡村妈妈们的苗绣手艺相结合，让用户可以通过小程序选择中国女排相关的图案，DIY一件专属的苗绣服装。

“我是创益人”是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腾讯广告和腾讯用户研究与体验设计部(CDC)联合举办的公益广告大赛，至今已举办了四届。大赛力图成为一个社会化创益的平台，一方面整合腾讯全域资源，发挥广告流量与技术优势，另一方面也连接传统公益机构、广告圈内的各类创意机构、设计院校以及品牌方，让多方公益力量跨界合作，形成公益生态。借助此平台，“香橙妈妈大学”项目也获得了广泛传播，让更多人关注到乡村妈妈这一群体。

截至2020年12月，友成“香橙妈妈大学”乡村女性就创业赋能项目已经在全国11个省份、98个县落地实施，共培训16413名贫困地区学员，其中67%

的学员通过电商领域的就业创业增加了经济收入，人均收入增加500至3000元人民币不等。收入的增加让乡村妈妈们增加了自信，也为她们的家庭带来变化。她们用自己的创意将家乡带到了更多人的眼前，同时也让自己活出了一个过去不敢想象的新面貌。■

本文所有图片均由友成基金会提供

河边村的扶贫实验与实践

专访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小云
作者：杨碧琼

2015年初，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全国扶贫专家李小云到云南省勐腊县勐伴镇做贫困调查，几番周折后，来到了热带雨林中的一个瑶族村庄——河边村。有感于河边村的深度贫困，以及“自己虽然长期从事扶贫工作，却从未做过一个比较长期的实验，而总是以星星点点的方式进行”，李小云动了在当地沉下来、做整村的开放性实践的念头。当年3月，李小云在勐腊县注册了公益组织——小云助贫中心（Action Against Poverty），带领团队进驻河边村，开始了他的整村扶贫实验。

河边村所在的勐腊县，在2019年之前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河边村在2011年被确认为国家级贫困村，全村57户，2015年人口总计206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蓝靛瑶族。实验团队对河边村的贫困状况进行了诊断分析，认定河边村是一个陷入贫困陷阱的、群体性贫困的深度贫困村。据此，他们提出：充分利用河边村的气候资源、雨林资源和瑶族文化资源，打造集小型会议、休闲、康养和自然教育等为特色的新业态产业。在政府支持下，李小云团队和村民通过建设“瑶族妈妈的客房”，来带动整个新产业的发展。在开发新产业的同时，村庄美化、厕所革命、厨房革命，以及会议、餐饮等设施建设也被纳入河边村的贫困综合治理工作中。

为了避免扶贫收益的外溢，河边村实验邀请全体村民以客房入股的方式，建立起河边村农户股份合作社——雨林瑶家合作社，负责运营全村的“瑶族妈妈的客房”。实验团队提供技术支持，同时培养青年

管理团队负责合作社的日常运营。从2017年开始，“瑶族妈妈的客房”的居住功能逐渐完善，带动了河边村自然教育、亲子游、康养、小型会议及餐饮业的发展，河边村开始经历生计策略的转型。

经过五年的扶贫，河边村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最明显的，一是生活条件改善，这里变成了一个真正美丽的乡村；二是村民收入有了很大的提升。然而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导致河边村的新业态遭遇重创，大部分原定活动被取消，农户收入锐减。时至2020年终了，在2021年春节前夕，李小云教授接受了本刊的专访，再谈河边村的现状和未来。

您最近是在河边村吗？村子里年前的景象如何？

对，我是1月26日来的。到了村里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大家都在议论今年的无筋豆一公斤卖到了11块。去年这个时候，正逢疫情，村民种的无筋豆都烂在了地里。他们说今年辣椒一公斤居然卖到了40块。我之前曾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河边村产业的再农化，这个趋势似乎变得更加明显了。我们讲到的“小农的韧性”，含义也在于此。当然，这个韧性还是与全球化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村民说无筋豆和辣椒的价格高是因为老挝的蔬菜都过不来了。随着春节临近，农民们都开始杀猪了，在村里似乎感觉不到太多疫情的影响。看着一栋栋干净漂亮的房子，雨林中的河边村在蓝天白云下显得更加美丽。脱贫攻坚为农民的生活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保障。我在想，如果回到2015年，村民还会不会像现在这样脸上充满笑容。

“瑶族妈妈的客房”带动的新产业在过去几年里让村民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但这种业态严重依赖外来客源，在过去一年的疫情环境下想必遭遇了不少困难？

从2020年年初开始，河边村的休闲新业态就遭到了重击。整个2020年，除了12月举行了一场会议以外，其余基本是零散客人。河边村过去几年新业态的主要活动，比如冬令营、夏令营和各种会议，大多被迫停止。寒假和暑假原本是河边村新业态收入的主要季节。但原计划在2021年春节期间举办的冬令营，也全部取消了。疫情给河边村的新业态造成的冲击是很大的，农户平均损失在五千到一万元之间，全村收入损失估计在20万到40万元之间。

您刚才提到再农化和小农的韧性，那么疫情之下，新业态停滞，河边村的韧性具体表现在哪里？起了多大作用？

在疫情的冲击下，很多农户的实际收入水平已经回落到了2015年和2016年的水平。有的农户2020年

的全家收入只有1万多块钱，主要依靠在外面打工。实际上在2019年，河边实验团队就已经注意到了农户家庭收入多元化对于应对风险的重要性，因此开始部署冬季蔬菜、中药材种植、养鱼、养蜂、酿酒等不同类型的农业产业示范。但是2018年、2019年新业态产业收入增长迅猛，所以大部分农民事实上并没有意识到产业再农化的意义和作用。2020年新业态产业遭遇重大挫折以后，那些积极参与农业产业示范的农户就呈现出了明显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些农户获得了户均一万至六万元不等的收入，极大地补偿了新业态收入的损失。2021年年初，对冬季蔬菜的市场需求强劲，因此种植冬季蔬菜的农户数量也多了起来，全村大概有十多户种植了冬季蔬菜，仅2021年1月，每户就获得了三千到一万元不等的收入。

您估计在2021年新业态能否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我们在河边村发展起来的新业态收入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收入链，到访的客人不仅增加了瑶族妈妈客房的直接收入，也带动了餐饮以及小商品的销售，同时还带动了农户的种植业和养殖业，特别是养鱼、养鸡和蔬菜种植。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形成了一个集体外出盖房的新产业。所以讲到新业态，实际上讲的是通过瑶族妈妈客房带动的新的产业链。从这个意义上讲，河边村发展的新业态的意义是很大的。但越是这样的产业，就越与外部的风险密切相关。所以河边村新业态在2021年能否完全恢复，完全取决于对疫情的控制情况。我的预期是，一旦疫情得以控制，旅游将是首先迅速反弹的产业。因此河边村在2021年的新业态还是会会有一个收入的反弹。

无论是农业还是非农业的产业，都需要从一个长远的周期去考察它的可持续性。当然，无论农业还是非农业产业，其发展都取决于宏观大环境，这个宏观的大环境一是国家的发展，二是世界的经济。河边村不是一个经济社会的孤岛，从某



2015年刚进驻河边村时，村子的全貌及村内人畜混居的状况



2018年，河边村家家户户都住上了瑶族特色的干栏式木楼

种意义上讲，这个没多少人知晓的小山村是与全球经济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疫情这么大的风险和危机面前，村民有没有对这场现代化实验的有效性产生怀疑？有没有想要退出新产业的村民？

河边实验的目的是为了让河边村搭上现代化的列车。雨林瑶家合作社的黄志成在茅草山村里帮助建设幼儿园，他告诉我说：“李老师，在那里待了一个月，回到河边村，觉得河边村太好了。”河边实验最大的收获是，每一个村民的生活，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与现代生活的距离大大缩小了。村民们最满意的实际上还是现在居住的条件和环境。村民们是很现实的。这不是一个依靠现金收入生活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便没有新业态的产业，他们有土地，有劳动力，也有自己的技能。村里的带头人邓林国说，我们不怕疫情，没有钱了大不了我们就去种水稻、种水果、养一头猪。很多专家讲，“大疫止于乡村”。我理解他们讲的不是说疫情不会在乡村发生，而是指乡村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我是一个发展主义者，我并不会因为乡村具有这样的能力而去忽视它对接现代化的必要性。

河边村没有农民想要退出这个新的产业，即便在疫情期间，还是有很多散客，餐饮服务也没有中断。2021年1月份，有几位来访的客人住了五天，接待他们的农户五天内就得到了1500元的收入。农民说，这个收入还是来得容易。村民们知道他们身处的雨林是个无价之宝，可能给他们带来利益，所以他们利用农闲的时候动员全村把村内的挡土墙全部修了起来，因为他们认为村里现在的环境还不足以让外面来的客人满意。这场风险反倒是锻炼了这些贫困小农的抗风险意识，特别是他们对自己前景的信心。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完全开放的、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建构一个乡村自给自足的乌托邦。事实上，城市的群体也在承受着市场波动的影响，农民不大可能置身事外。

在疫情重创之前，河边村的村民如何看待这个收入渐高、外人眼里的“美丽乡村”？对于外力介入带来的成果，村民有多大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河边实验不是一个简单的提高收入的实验。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同志考察河边村，一下车就与迎接他的村民们交谈。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的普通话是从哪里学的？”雨林瑶家合作社的CEO周志学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开着合作社的皮卡车到茅草山去，回来的时候疫情检查站的同志把车拦下来问话，他们都用普通话回答，然后检查站人员让他们下车接受检查，这时候他们都用瑶族话回答，检查站的人就惊讶道：噢，原来你们是本地的？河边村的村民人人会讲普通话，河边实验在村里建了幼儿园，希望将贫困的问题放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逐渐解决。村民自己讲，我们将来的孩子们跟我们肯定不一样了。镇里的小学老师也反映，这几年河边村来的小学生和以前大不一样。

河边实验团队的老师和学生对在村子里的各种活动是比较谨慎的。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们逐渐建立起了信心和自豪感。雨林瑶家合作社的尹文刚跟我说，李老师，在你来之前，我是一个内向的人，不太爱讲话，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现在大家看到的我都很开朗，我觉得很有信心。勐腊县的一位副县长就是瑶族人，他很长时间没有来河边村了。2020年年底，他来河边村参加一个会议，兴奋得不得了，告诉我说他小时候经常来这里，他是瑶族人，和这里好多人都有亲戚关系，他说没有想到这里有了这么大的变化。村民们看见他就笑，他到亲戚家看到那栋房子，很干净。村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对于这个过程有着强烈的拥有

感。这个变化不完全是我和我的团队给他们带来的，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是他们自己组织搞起来的。外面来参观的人很多，过去瞧不起他们的傣族村寨也到他们这里来学习。河边村的带头人邓林国说，现在河边村骄傲了。他说的其实就是一种自豪。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掉队的人，有些农民觉得这些事跟自己关系不大。

河边村这几年村民收入增长，但全村57户家庭，一年内竟有4个家庭离异。据您观察，主要原因是什么？

前几天勐腊县委书记崔云青同志来村里时还问我：小云教授，村里离婚的事情你研究明白了吗？这个说起来确实让人觉得困惑。河边村过去几年里有四五个家庭离异，而且都是女方出走。村民们把这归咎于微信，说是在微信里一聊天，抵不住诱惑就跑了。河边村现在生活水平提升了，环境也改善了，可以说是方圆里最好的村落了，这人反倒要跑了。而且离了婚的妇女去的并不是什么大城市，她们现在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未见得比河边村好，所以连我的同事都感到不解。虽然离婚在这里仍然属于个例，但是它所呈现出的社会学含义是复杂的。河边村这个地方普遍存

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完全开放的、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建构一个乡村自给自足的乌托邦。这场风险锻炼了这些贫困小农的抗风险意识，特别是他们对自己前景的信心

“瑶族妈妈的客房”这种新产业形式的介入，有没有影响到村子里传统的男女劳动分工？

瑶族妈妈客房这个新的业态原本假设是由女性来负责的，但事实上男性劳动在这方面的投入也比我们预想的要多，很多客房管理工作也成了家庭里男性的职责。瑶族妈妈客房把劳动空间与生活空间合二为一，这既为女性实现家庭就业创造了条件，同

时也吸纳了男性的剩余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瑶族妈妈的客房这样一个新业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性别的劳动分工，对女性的赋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您此前在一篇文章里反思了快速“去农化”扶贫途径的可持续性，那么接下来河边村要怎么走？

河边实验过程中的确出现了“去农化”和“再农化”的现象，这一现象是河边实验在产业发展方面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最终的方向应该是三产融合。将三个产业在一个村庄里融合，是一个特别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过程，所以我讲河边村的发展需要进入一个谨慎而缓慢的现代化的过程，因为一产、二产、三产不仅需要不同的技能，最重要的是需要不同的观念。现在河边村村民的思想观念和技能都无法适应三产的融合，所以需要在在一个缓慢的过程中不断地培养一批能够面对市场经济变化、管理村庄的团队。这些河边村现在还都不具备，所以接下来的任务更多的是要从团队的培养方面着手。

河边村有没有足够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来支持后续的发展？

河边村是一个相对封闭、边缘的少数民族村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力资源的外流并非十分明显，但现在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状况：自2015年我来到这个村子之后，先后有四个年轻人考上了大学，我很关注他们的流向，他们没有一个是愿意回到村庄里的，实际上也没有人回来。我也可以假设，随着村庄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接受教育的孩子们估计也都不愿意再回来。这的确是个悖论，一方面我们希望青年人留下，另一方面青年人又不断搭载着现代化的列车流出乡村。

传统与现代的悖论，不是河边实验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在河边村建立了雨林瑶家合作社，培养了一个很具有现代就业特点的就业模式。合作社有漂亮的办公室，配置了电脑以及外出使用的车辆，但是这依然无法与现代的城市相媲美。最近我看到报道讲，日本未来会有数百个小乡镇消失，青年人依然纷纷流向大都市。我去过日本，亲身感受过东京都市的繁华，也感受过了日本乡村的凄凉。实话讲，日本乡村的基础设施、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的，但现代化的最大诱惑不仅仅是这些，而是那种能够抓住人的多方面需求的文化，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工业化、都市化的文化。这既是现代化的魅力，也是现代化的魔性。我不知道河边村未来的年轻人在受了很好的教育之后会不会都留下，其实我在很多地方讲，我们也无法让很多年轻人都留在乡村。但是，总会有一些年轻人会留下来。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是能够让留下来的人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的环



2020年8月的河边村

境。所以河边实验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尽可能在村庄逐渐形成现代化的业态，这是河边实验在微观上所能做到的、尽可能缓解乡村衰落的一些尝试。

雨林瑶家合作社自身的市场对接能力和资源都相对匮乏，使得新业态发展严重依赖扶贫实验团队。这种情况下，您有无重新考虑过请现代企业介入，采用“公司+农户”的方式？

河边村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缺乏能够应对市场的管理资源。我的团队也不是能够带领村民走向市场的团队，让我们管理这个村庄，也未必能够挣到钱。河边实验从2018年开始逐渐转入由雨林瑶家合作社的年轻人自己管理，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雨林瑶家的CFO李进已经完全掌握了对接企业公司税务、会计的技能，他正在考取会计师资格证。这些年轻人已经呈现出能够管理这样一个合作社的基本能力，但是如何对接大的市场，将这个产业推向市场，他们的能力还远远不够。因此我们再次面临着是否需要引入外部公司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否可以采用公司+农户的方式展开营业。

河边实验团队目前采取的策略是引入旅游文化企业，把河边村当作一个公益项目，由这些企业帮助雨林瑶家合作社来打造市场，培养他们的能力。携程集团下的旅悦集团已经和河边实验团队达成了协议，开始进入河边村了，帮助河边村打造管理能力和对接市场。

实际上，对于特别贫困的地区，引入公司、引入外部资本，我一直是比较谨慎的。我比较主张通过社会企业或公益的模式来打造村庄的能力，因为这样的贫困村庄一旦主导权不在自己手里，信息、能力和资本的不对称就会形成对乡村的剥夺。所以，

我们需要社会力量的介入来平衡能力、资本和信息的差异。

如果说河边村的扶贫是一场实验的话，您打算将这场实验进行多久？

说河边村的扶贫是一场实验，实际上也是我和团队的一场实践。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跟我讲，小云同志，你现在不能离开河边村，你应该把这个实验进行到底。我觉得我会把这个实验一直进行下去。

总结了河边村的经验之后，您有没有打算在别的地方再进行一次实验？

从某种程度上讲，河边实验太依赖我个人和我的团队。这样的情况目前在河边村表现得还是很明显的。村民对李老师和其他老师，甚至学生，都有某种依赖感。他们经常会说，李老师你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村民们是现实的人，在过去几年中，他们看到了好处，但这无形中也增加了对我们的依赖，这是河边村实验最大的遗憾。所以我目前在昆明、临沧和怒江都开始了新的实验，在这些工作中，我采取的方式是完全由地方来主导，我们团队不长期驻村，而是定期过去与他们交流讨论。■

本文图片均由李小云教授团队提供
本刊感谢友成基金会在此次采访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瑶族妈妈的客房



瑶族妈妈的客房

腾讯为村： 连接为乡村

寻乌位于中国江西省南部，是一个多数中国人都没听说过的山区县。和很多贫困地区一样，寻乌县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和孩子留守家乡。到2019年，当地基础设施仍有不足，全县173个行政村中有150多个村庄缺少照明路灯，给出行造成极大不便。给村里建路灯，成了寻乌脱贫攻坚的迫切任务。

寻乌的对口帮扶企业是中国的头部互联网公司——腾讯。所以，在当地建路灯，应该是个再简单不过的任务，由腾讯捐赠修建即可。况且腾讯公司也一直在积极参与扶贫。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腾讯基金会累计对外捐赠逾45亿元，其中超过80%用于扶贫项目；腾讯公益平台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募捐平台，累计为九万多个项目筹款逾115亿，其中90%是扶贫项目。

但这一次腾讯却拿出一个不同以往的方案：全县预计一共需建设7800盏路灯，花费1560万元，腾讯基金会承诺全额捐赠，但到底有多少路灯能被点亮，则由村民参与决定。

项目被定名为“点亮寻乌”，从项目推进到财务公开，都通过互联网完成。村民需登录一款名叫“腾讯为村”的应用程序，通过在该程序上的活跃度来决定本村获赠的路灯数量。当活跃村民占本村户籍人口的10%、20%、30%时，该村庄将获得预定路灯数的60%、80%、100%。线上村民数达到本村人口40%、50%时，所获路灯数将超出预定数字，达到原定目标的110%、120%——算是给村庄的奖励。

方案公布之后，寻乌县各村村民积极响应，在“腾讯为村”平台上踊跃参与。很快，全县各村都获得了预计路灯数量并完成了落地建设。至2020年春节前，寻乌县实现了“村村通路灯，夜路有照明”的扶贫小目标。

这个看似曲折的扶贫故事，实则体现了腾讯借助“为村”平台，在农村“连接一切”的野心。中国的农村人口正面临着“失联”的窘境：人口外流，打工者与家乡渐行渐远；留守的老人和儿童获取信息能力不强，对外界发展不了解；信息封闭使得很多村



普通村民的社交半径拓宽过程

庄发展停滞乃至衰败。“为村”是腾讯为农村用户打造的村庄数字化开放平台，通过互联网为乡村连接情感、连接信息、连接财富。在“点亮寻乌”的故事里，被点亮的不只是村庄街道，还有远游的村民对家乡的牵挂。他们一听说家乡要建路灯，就积极登录平台，建言献策。

除了连接情感和信息，“腾讯为村”也在帮助村民寻找致富机会。广东省龙川县是这个富裕省份内的一个相对贫困的小县城，2016年脱贫摘帽之前，当地有70多个贫困村，1万多个贫困户。当地有水产养殖、肉鸡养殖、柚子茶加工等特色产业，但由于远离珠三角大市场，这里的农产品缺乏销路，没办法规模化经营。2017年，龙川县珠塘村入驻“腾讯为村”，扶贫干部刘攸伟决心用它开启一场互联网扶贫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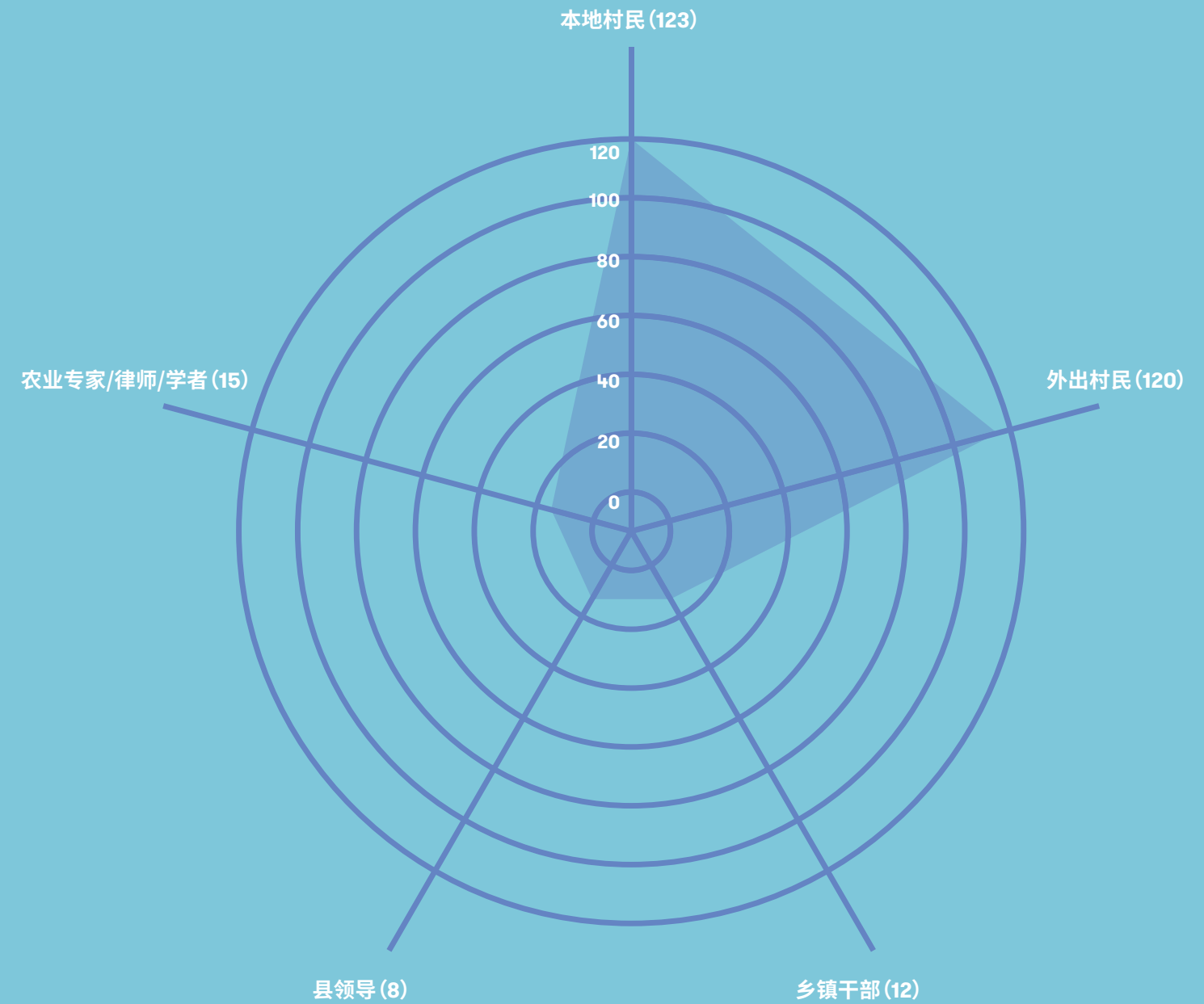
他在本村主页的“村有好货”板块，置顶了当地有名的“果园走地鸡”。顾客只要填写地址、付款购买，128元的“走地鸡”就会送货上门。最开始是本地村民买，随后附近乡镇的村民慕名前来。2018年中秋节假期，很多外出打工的村民返乡，当地最大的“走地鸡”养殖场三天就卖出了2000多只鸡。通过对口扶贫，很多深圳人成为龙川“走地鸡”的消费者。

珠塘村有柚子、板栗、油茶等经济作物，鱼塘草鱼、牛蛙养殖、稻田养鸭等养殖业，过去农民自给自足，现在和市场实现对接。家乡经济发展，使一些外出打工者看到机遇。有人回乡建设了生态农庄，将果树种植、观赏花卉、生态养殖作为观光项目，珠塘村有了第一家酒店。

最近十年的中国，智能手机和移动通信普及，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数字化差距在日渐缩小。当代中国乡村正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乡村振兴战略机遇期，数字化的作用愈发明显。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村”平台及时发布官方防疫信息，提供权威

医学和科学信息，各地“为村”管理员积极行动，配合基层防疫，这些都有效地帮助了农村防疫。

中国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都还比较薄弱。“腾讯为村”直抵乡村基层，向村民提供服务，凝聚人心，激发活力，这也符合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念。腾讯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所做的探索，给其他互联网公司提供了启发，也为全球减贫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接入“为村”平台五个月后的村民社交人数

《区块链养鸡场》： 科技如何改变中国 农村人口生活

在新书《区块链养鸡场》中，中国的一位养鸡户告诉作者王筱玮，散养鸡不容易。因为“鸡不太聪明”，他说，“如果你开着灯，它们就会集中聚集，结果导致踩踏死亡。”即使让鸡在阳光充足的场地里自由放养，养鸡户还会遇到一个新问题：你必须说服城市里的挑剔顾客，让他们相信你所说的生态养鸡方式是真实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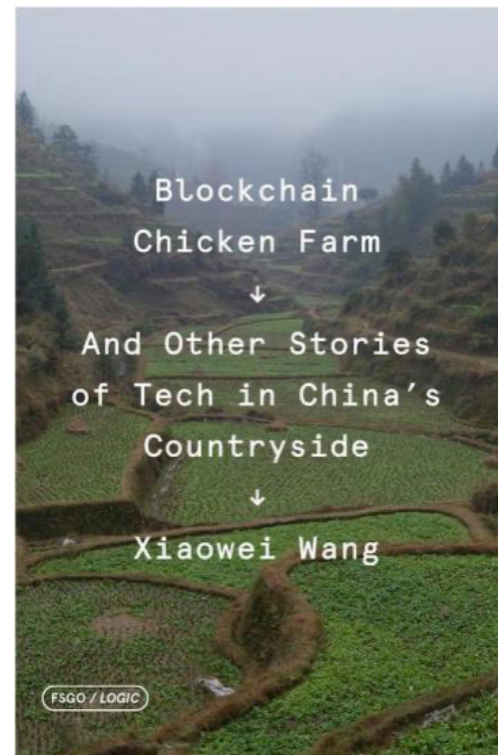
为此，养鸡户开始求助于高科技的养鸡监控。他们给鸡配备了可穿戴脚环，印有二维码的计步器可以跟踪鸡的行动和位置。养鸡户还与科技企业合作，用区块链记录数据。区块链技术因为创建比特币而受人瞩目，但它最重要的特征是可以制作几乎不可能被篡改的数字记录。消费者在购买鸡的时候可通过二维码获知鸡的所有相关信息。

区块链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核心科技之一，它有助于打造消费者对生态食品供应链的信任。近几年来，阿里巴巴、京东和网易等大企业开始进军食品行业。在人工智能、信息学、区块链和传感器的帮助下，科技巨头们正在促进生产和运输集中化。

在《区块链养鸡场》中，王筱玮向读者介绍了中国各地很多这样的故事，讲述科技是如何改变了中国农村人口的生活。

我们在书中可以看到号称“山东第一淘宝村”的丁楼村，这里的专长是生产服装然后销往世界各地。几乎家家户户都把房子变成了工厂和作坊，处处可见宣传农村淘宝的横幅和标语。王筱玮看到一个女人“穿着高跟鞋和红裙子”爬到桌子上，熟练地用布料层层拼接一套服装，旁边还有一只鸡在叫。

在浙江省，珍珠养殖者耐心地用猪粪和鸡粪喂贻贝，把品质最高的出品高价卖出。质量较次的珍珠被运到半个地球外的美国网络直播营销商那里，让他们通过网红的“珍珠派对”，以每颗20美元的价格出售。



王筱玮，《区块链养鸡场：中国农村科技故事集》，FSG Originals x Logic出版，2020年10月。
www.fsgoriginals.com

再以猪肉生产为例。为了提高养猪场的产量，阿里巴巴培训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ET农业大脑”，利用猪肉操作的大量数据，更好地预测如何提高产量。他们建立了一个“数字城镇”，年轻工人整天坐在那里，点击猪的照片，给它们贴上生病或健康的标签，以训练人工智能。短期内，人工智能确实有助于优化大幅增加的猪肉生产。

得益于令人眼花缭乱的崭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各种返乡创业激励政策，中国的乡村振兴计划正在蓬勃发展。作者被告知，仅在一个小村庄，过去一年内就有500多人返乡工作。“科技的创造力和应用真的很吸引人，也让人心中满怀憧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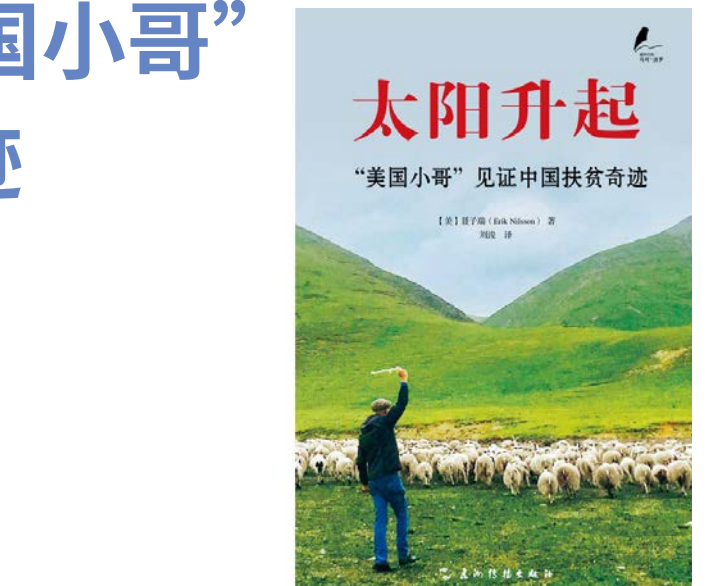
太阳升起——“美国小哥” 见证中国扶贫奇迹

聂子瑞(Erik Nilsson)2006年来到中国时，绝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在高原上骑牦牛、被牦牛踢，甚至还会去捡牦牛粪当燃料。

来华十余年间，作为一名记者和志愿者，他曾经去过中国许多贫困地区，见证了这些地区日新月异的变化。最近，他在新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里整理了自2006年以来他亲身探索中国的扶贫方案、灾后救援以及整体发展的报道，记录下了他亲历的那些鲜活生动的故事，彰显出在全球背景下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性和面临的特殊挑战。

他从汶川地震讲起。跟随他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贫困和地理环境所导致的悲剧终将在救援和重建中被克服，在这片无数生命逝去的地方，人们也重拾起希望。在“地球第三极”青藏高原，他亲见中国克服了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等不利因素，给高原带来了数年前还不可想象的富裕。

聂子瑞过去十多年里采访过全国各地很多扶贫项目，他在书里对其中一些作了回顾，包括贵州乡



《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五洲传播出版社，2021年

村的虚拟现实娱乐公园、内蒙古牧民开办的鹧鹑农场等。为写作此书，他还花了5个星期，采访了长江经济带沿岸数千公里的11座城市，以沉浸方式来分析改革开放如何驱动了中国的扶贫奇迹。

本书含中、英两册，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书中附有相关报道的汉英双语短视频。

聂子瑞作为记者走遍了中国大陆的每一个省份，报道扶贫、救灾和政府政策。2011年，他曾发起一个志愿者行动，为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牧民社区有待发展的学校送去太阳能电池板、衣物、药品、食物和学习用具。他的团队为有残障的孩子提供手术、义肢和轮椅，并为低收入牧民家庭的子女提供大学奖学金。2016年，这位当时33岁的美国人成为“中国政府友谊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外国获奖者。这是中国政府为表彰外国专家“在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而设立的奖项。



抗疫之年， 月事也是事

杨碧琼



2020年8月，腾讯公益平台上出现了一项名为“月季计划”的募捐项目，项目打算筹集9万元，用于为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女学生购买经期卫生用品。项目的发起人是“拾她”（Stand Together）俱乐部，由成都七中国际部的一群女高中生组成。项目在平台上发布时，俱乐部的成员们心怀忐忑，担心没人会把一群十六七岁的姑娘们当回事。

然而，事实超出了她们的预期。仅用了一天多的时间，“月季计划”就筹集到了近12.5万元，足够为凉山州昭觉县的700多名女生购买半年用的卫生巾。更重要的是，“月季计划”的实施也让更多人关注到贫困地区的月经贫困问题。

月经贫困指的是女性在生理期无法获得正规的卫生用品。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调查显示，2019年，全球有4000万女性正在经受月经贫困，在中低收入国家，有超过50%的女性不得使用自制的经期用品。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于一些发达国家内，比如在英国，根据非政府组织 Plan International 的调查，有十分之一的女孩买不起正规的生理期卫生用品，42%的女孩称因为无力负担，不得不用袜子、手纸等替代品。

在中国，据《中国慈善家》统计的数字，贫困儿童数量约为4000万，其中12至16岁、面临生理期的女童约占10%。也就是说，大概有400万女童面临月经贫困问题。“月季计划”所关注的凉山州昭觉县距离成都500多公里，但两地在平均收入上有天壤之别。这里是凉山深处的一个极度贫困县（直到2020年才摘了帽），在2019年底，全县有55个贫困村、3.3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募捐计划开启前，“拾她”俱乐部的成员们到昭觉县四开乡的学校里实地调查，结果让她们猝不及防。当地卫生巾的零售价格和在成都是一样的，均价每片1

元。很少有女生能够负担得起这样的价格，因此通常购买价格为卫生巾六分之一的大包卫生纸作为替代。

当地四开中心校的一位老师说：“农村中有很多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为了摆脱贫困不得不把年幼的孩子交给老人照顾，这导致了家庭生理卫生教育的缺失。有的女童初次来月经时不懂得如何护理。慌、乱、害怕、着急，几乎成了很多女孩子的心理常态。因为贫困，孩子们在经期间没有钱购买好点的卫生用品，不得不选用布条、卫生纸等材料。对于自己经期间的不适，女孩子们又羞于启齿，于是逃课、请假成为日常。”

月经贫困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买不起卫生用品的问题。除了卫生用品价格过高外，它的成因还包括人们对女性生理健康的认识不足，以及社会整体对月经的种种忌讳，即月经羞耻。21世纪已经过去了

五分之一，但月经这个半数地球人口都会经历的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在很多地方依然被视为禁忌。经期间的女性被视为不洁，甚至要被迫离家住进草棚子里。很多妇女因此饱受妇科疾病困扰，很多女孩因此缺课。月经贫困危害着女性的身体、生理和心理健康，也加剧了性别不平等。

“月季计划”并不是月经贫困话题第一次进入内地大众的视野。

事实上，近几年来，尤其是自从

2018年根据印度草根企业家阿鲁纳恰拉姆·穆鲁加南萨姆（Arunachalam Muruganantham）的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上映以来，有关女性月经的公共讨论越来越多。这部电影原名“Pad Man”，中国网友形象生动地将其翻译成“护垫侠”，正式上映时片名被改为“印度合伙人”。

贫困儿童数量约为4000万，其中12至16岁、面临生理期的女童约占10%。也就是说，大概有400万女童面临月经贫困问题

#姐妹战疫安心行动#话题在微博上的阅读量达1.2亿次，讨论超过15万次。越来越多的人在肯定女性劳动者在战疫一线的价值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她们的劳动保障问题和经期用品需求问题

2020年2月份,正当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肆虐、疫情相关新闻占据线上线下几乎所有媒体平台之时,一个有关经期的话题在网络上被热议。一位微博博主注意到,在全中国捐赠各种抗疫物资、驰援武汉之际,卫生巾、安心裤等女性经期用品却并没有被列入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的清单内,一线女性医护人员对经期用品的需求被忽视了。于是这位博主及其团队在网络上发起了“姐妹战疫安心行动”,进行募捐及协调捐赠活动。他们联合灵山慈善基金会,在新浪微公益和“为爱联合劝募”两个平台上发起公募,从2月7日到3月13日,共筹款251多万元,统统用于为抗疫一线女性医务人员购买卫生巾、安心裤、一次性内裤等物资。

#姐妹战疫安心行动#话题在微博上的阅读量达1.2亿次,讨论超过15万次。越来越多的人在肯定女性劳动者在战疫一线的价值的时候,也开始关注她们的劳动保障问题和经期用品需求问题。

但“姐妹战疫安心行动”团队所呼吁的将女性经期用品纳入国家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清单的诉求,并未得到落实。该团队的志愿者在实际对接中也发现,仍有很多单位认为经期用品并非“必需物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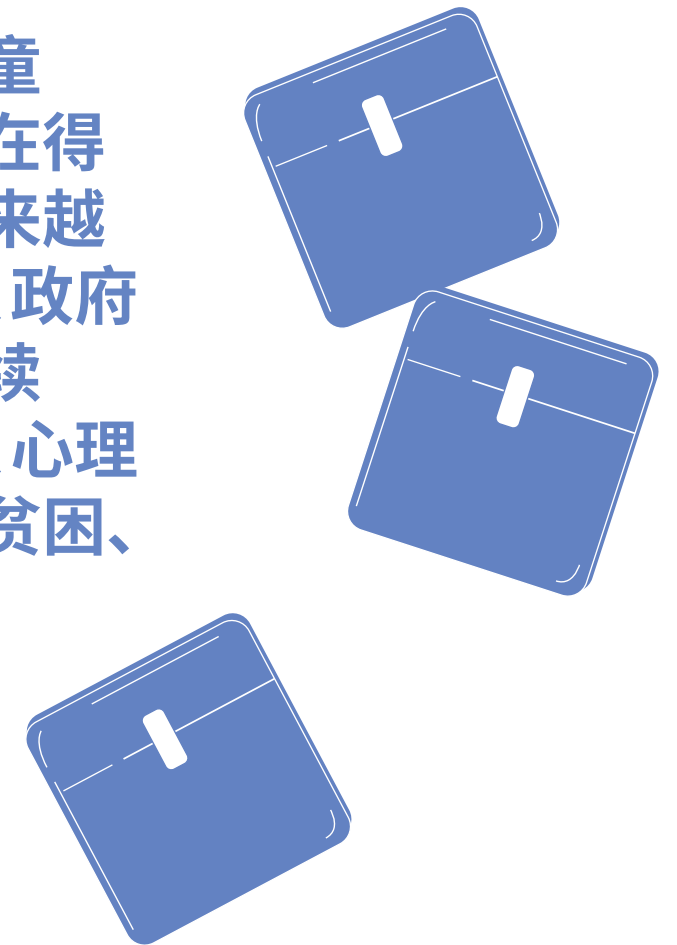
在2021年1月河北疫情暴发导致“封城”时,一线女性医护人员和当地女性居民再次经历了缺乏经期用品的窘境。

月经话题再一次被热议是在2020年8月28日。当天,一个#散装卫生巾#的话题在短时间内迅速冲上了微博热搜。起因是一位博主在淘宝上偶然发现了散装的卫生巾产品,100片售价21.99元,无品牌、无包装。这位博主发问:这么便宜的三无产品也敢用?有人留言:一包卫生巾不过是一杯奶茶的价格而已,何至于此?对于这些不啻于“何不食肉糜”的问题,一些买家回复“生活难”“我有难处”,瞬间戳中无数网友的心脏。话题迅速升温,阅读量10亿以上,超过20万条评论,再一次把月经贫困问题抛到大众眼前。

引发大争论的散装卫生巾,在查证过程中几经反转,终被下架。但在电商平台中搜索“散装卫生巾”,会发现类似的商家有很多,而且有的店铺月销量达到几千件。在买家评价中,常见“量大实惠”“性价比高”这样的字眼。

在各类经期卫生用品中,卫生巾在内地市场上的渗透率最高。那么市场上的卫生巾到底贵不贵呢?

值得欣慰的是,女性和女童面临的月经贫困困境,正在得到社会的更多关注,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公益组织、政府力量和个人,正在通过持续捐赠、定期生理健康教育、心理辅导等方式,为解决月经贫困、破除月经羞耻做出行动。



以市场上常见品牌作统计,按单片价格,可以分为低档(低于1元/片)、中档(1元~1.5元/片)和高档(高于1.5元/片)。假设一名女性的经期为5天,睡眠时间8小时,白天每4小时更换一片卫生巾,那么这位女性每天需使用4片日用卫生巾及1片夜用卫生巾。以日用卫生巾每片1元、夜用卫生巾每片2元计算,这名女性每天需花费6元,一次经期即为30元,一年就是360元。如果更换频次更高、卫生巾价格更贵、生理期延长,花费相应增加。

一年360元看似不多,但中国有6亿人口月收入低于1000块钱。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任何一笔花费在女性经期用品上的钱,都有可能得从一家人的饭钱里抠出来。

值得欣慰的是,女性和女童面临的月经贫困困境,正在得到社会的更多关注,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公益组织、政府力量和个人,正在通过持续捐赠、定期生理健康教育、心理辅导等方式,为解决月经贫困、破除月经羞耻做出行动。比如上海仁德基金会从2017年开始发起的“春柳计划”,给四川、陕西等地的留守女童提供卫生包、生理知识课程等生理期关怀;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的“女生加油计划”关注贫困山区的女童。更有年轻一代

的女性,越来越有勇气直面月经话题,通过女性信任和互助的形式,比如“卫生巾互助盒”,来抵抗月经羞耻。

国际范围内,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月经贫困给予了关注并做出相应的改变,对经期用品实行低税、零税或者免费提供的政策。目前中国对经期用品征收的是与大部分普通商品相同的13%增值税。■

文化视觉

环境移民：最后的幻想

亚历山德罗·格拉萨尼

环境移民注定会成为地球上新的人道主义危机：在不久的将来，整个地球将不得不承受环境后果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负担。据世界银行预测，到2050年，估计有1.43亿国内气候移民；国际移民组织的预测估计，到2050年，可能有2500万到10亿环境移民，最被普遍认可的预测数字是2亿人。

气候迁徙主要是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国家内部迁徙，这种迁徙并不会影响对改变生态系统负有责任的富裕国家，真正影响的是这些移民的原籍国，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本已过度拥挤和退化的城市地区。我们会看到，贫民窟在城市里无节制地扩张，没有任何城市规划可言，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最终成为环境移民的陷阱。移民者无法就业，生活在贫困且不人道的条件下。

我从2011年起开始进行这项长期的拍摄项目，期间跨越了好几个国家，见证了因气候变化而被迫迁徙的牧羊人、农民、渔民、妇女和男人的生活。我

把关注重点放在蒙古、孟加拉国、肯尼亚和海地，这几个国家代表了全球范围内影响环境移民现象的几个不同类型的气候变化：蒙古极度寒冷，肯尼亚沙漠化，孟加拉国和海地洪水、飓风肆虐，海平面上升。我以同一种叙事方式来讲述这些故事：在每一个国家，我都将在农村与环境灾害抗争的人们故事与那些挤在首都贫民窟的环境移民的恶劣生活条件进行对比。

我们已然回不去了，未来几年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

标题“最后的幻想”意指环境移民一心希望摆脱环境压力，在城市里找到美好生活。然而，当他们来到城市，却发现由于缺乏资源和机会，一切对美好未来的梦想最终都落了空。

蒙古

2010年，蒙古遭遇了史上最严酷的寒冬，800多万头牲畜被冻死，约2万名牧民被迫向首都乌兰巴托迁徙。过去10年，乌兰巴托的人口翻了一番。其中60%的人口聚集在格尔区，这个贫民窟的城市规划乏善可陈，没有自来水和电力。就是在这里，因气候变化而被迫离开农村的牧羊人在所剩无几的细碎空间里搭起帐篷。习惯了草原生活的牧羊人，被迫来到陌生的城市环境，发现生活举步维艰。





肯尼亚

肯尼亚的牧民是非洲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之一。干旱和不同牧民部落之间为了给牲畜寻找草场和水而发生的冲突,使得许多梦想着美好未来的肯尼亚人被迫迁往内罗毕。根据联合国人居署2008年的一份报告,生活在内罗毕贫民窟的环境移民中,有74%是在过去20年里来到这里的(与近年来干旱的加剧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有关)。

基贝拉是内罗毕人口最多的贫民窟,也是非洲最大的贫民窟,约有100万人生活在这里,条件非常艰苦。据联合国人居署统计,目前非洲有超过5.7亿贫民窟居民,其中超过一半(61.7%)的城市人口生活在像基贝拉这样的贫民窟。气候变化在这个残酷的城市增长过程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在经济和环境的双重压力下,首都达卡每年要迎来30多万新移民(世界银行数据)。达卡被认为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之一。目前该市约有2000万居民,但根据人口增长模型,多伦多大学预测,到2050年,达卡将成为世界上人口第三多的城市,约有3520万居民。国际移民组织估计,达卡70%的贫民窟人口是为了逃离气候变化而迁到这里。





海地

海地是世界上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方之一。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日益频繁的干旱、飓风和洪水将使海地已然退化的现有环境进一步恶化。海地的树木几乎被砍伐殆尽,这使得当地环境成为世界上最脆弱的环境之一。对树木的破坏大大降低了土地吸收极端天气事件和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

该国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引发了从农村到城市地区的移徙浪潮。在海地首都和最大的城市太子港,有一半的居民不是在那里出生的。这个城市拥挤不堪,但每年仍然有成千上万名环境移民涌入。根据海地统计和信息学研究所及Quixote中心的数据,目前有超过25%的海地人口生活在太子港大都会地区。



对话创新者

世界粮食计划署： 创新和数字化转型， 解决人道危机

萨拉·奥兰多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于1961年由联合国大会及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 (FAO) 建立,它是全球最大的人道主义组织,由各国政府、组织和个人自愿出资扶持发展。

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各项工作中,实现联合国消除贫困和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大重点。2019年,世界粮食计划署通过紧急食品或现金援助项目、营养支持项目以及参与气候恢复和其他重大事件恢复活动,向88个国家近一亿人提供了援助。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大大增加了全球贫困和饥饿人口数量。在也门、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南苏丹和布基纳法索等国,暴力冲突和疫情使饥饿人口数量急剧增加。面对全球疫情,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全世界展示了其“攻坚战”的强大能力。正如该组织的宣言一样,“在医学疫苗到来之前,粮食是防止混乱的最好疫苗”。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也是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授予世界粮食计划署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其在“抗击饥饿、冲突地区和平状况改善以及推动防止利用饥饿挑起战争和冲突中所做的贡献”。

“诺贝尔和平奖并不属于世界粮食计划署这一个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大卫·比斯利 (David Beasley) 在获奖感言中说。“我们与各国政府、组织和私人合伙人保持密切合作,他们和我们一样,积极地帮助饥饿和弱势人群。没有他们,我们帮不了任何人。我们是一家运营型机构,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诚信、人道和包容’,激励着我们每天的日常工作。有冲突的地方就有饥饿。而有饥饿的地方,通常伴有冲突。今时今日对我们是个提醒:食品安全、和平和稳定是并行发展的。没有和平,我

们无法实现全球零饥饿的目标;如果存在饥饿,我们便无法拥有一个和平的世界。”

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2019年11月公布的执行委员会文件《私营合伙和筹资战略(2020—2025年)》,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愿景是致力于转变世界粮食计划署与企业和其他行动方——尤其是在地方层面——的合作方式,以挽救和改变更多的生命。这个新发布的五年战略制定了一种新的方法,即一方面主要依赖企业实现技术合作,充分利用其专业知识、能力和宣传支持,另一方面依赖个人,实现资金

支持,以帮助填补世界粮食计划署的资金缺口。该战略基于三大互相关联的支柱,有助于实现零饥饿目标和2030年发展议程的更多目标:影响、收入和创新。

影响:通过与私营部门搭建技术合伙关系,建立一流的技术合作组

织,提升在地方层面上的影响;收入:通过新型个人供给方式、投资数字化筹资战略,发展可持续灵活收入,让全世界的人员参与其中;创新:让世界粮食计划署探索更多的新型参与方式,找到创新和合作型解决方案,通过新技术和新工作方式,更好地服务于人类。

在该新战略框架内,2021年4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同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共同倡导学龄儿童和年轻人的教育、健康、营养和福利需求,以期实现各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全球新冠疫情和它所造成的学校停课已经再次凸显了教育和健康之间的关联关系。我们知道,学校不仅仅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它还可以提供很重要的社会空间,提供各项关键社会服务,比如学校供膳、接种疫苗以及健康教育,这些都是学习者的健康、归属感和福利的核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斯蒂芬妮亚·贾尼尼 (Stefania

在医学疫苗到来之前,粮食是防止混乱的最好疫苗

Giannini) 说道。她同时强调了良好营养和健康对于确保所有儿童和年轻人获取和充分利用学习机会的重要性。

世界粮食计划署创新加速器

“我们相信，创新可以帮助我们扩大影响，帮助地球上更多的最弱势人群，”世界粮食计划署创新加速器负责人伯恩哈德·科瓦奇 (Bernhard Kowatsch) 在2020年下半年的一次访谈中对《快公司》(Fast Company) 说。世界粮食计划署被《快公司》列为2021年最具创新非盈利组织名单第二名。

“创始人员有六人，大家挤在慕尼黑一间租来的办公室的黑色皮革沙发上，听着模拟筹款方案。如果不是贴在墙上的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标志，人们没准儿会以为这是一间大学宿舍，或者是硅谷、拉各斯或其他什么地方的一家初创公司……从某种角度来说，它也确实是的。”乔纳森·西姆斯 (Jonathan Simms) 今年早些时候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官方媒体渠道上写道。

2015年末，没有其他哪个联合国机构在尝试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做的事情：引入私营部门加速器方式，支持在人道主义及发展工作中发挥作用的初创公司和非盈利创新企业。

加速器总部位于慕尼黑，组织为期一周的训练营（新冠疫情暴发后，转为线上运营），还有一个为期六个月的“短期项目” (Sprint Program)，旨



世界粮食计划署创新加速器初创之时@WFP

在帮助相关项目开发模型，验证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发展概念。对于值得继续支持的项目，加速器会帮助它们进入“规模化推广”阶段，提供定制化的支持内容。

抗击饥饿、冲突地区和平状况改善以及推动防止利用饥饿挑起战争和冲突中所做的贡献”

截至目前，加速器发起和参与了45个国家的80多个项目。仅2019年一年，项目内开发的创新技术就给全球140万人的生活带来了积极影响。加速器负责人伯恩哈德·科瓦奇说，正是由于团队的多样化和特殊背景（来自30多个国家的50余名成员，他们在人道主义、创业、技术和设计领域拥有丰富经验和出色能力），才有今天的成绩。

团队成员的多学科能力和丰富经验，让团队可以识别并支持那些创举性的提案。从为一家非洲创业公司（致力于开发为难民营服务的APP）提供落地专业知识，到协助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位创新者建立一个可持续业务模型，或部署先进的技术解决方案，加速器的每位成员都发挥了自已的重要作用。

加速器已经测试过多项解决方案，特别是在新技术利用方面，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更是如此，比如区块链技术（将现金移入虚拟钱包，这样难民就可以远程购买食物）、电子商店（让坦桑尼亚的弱势群体可在线订购食物）。2020年，世界粮食计划署推广了11个项目，受益人群直接赶超上一年度的140万人。



乍得妇女展示她们的水培饲料丰收成果@WFP

没有和平，我们无法实现全球零饥饿的目标；如果存在饥饿，我们便无法拥有一个和平的世界

ShareTheMeal

2014年4月，塞巴斯蒂安·斯特里克 (Sebastian Stricker) 和伯恩哈德·科瓦奇 (Bernhard Kowatsch) 在柏林创建了ShareTheMeal。自从2015年正式发布以来，它已经演变成成为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个创新项目，旨在向叙利亚的难民儿童提供食物。

ShareTheMeal是一个APP程序，其初衷是作为一个创新性筹资方式，吸引新一代的年轻捐赠者参与进来。现在，通过该获奖程序，用户只需轻触手机，捐赠0.8美元，便可帮助一名饥饿儿童。

全球大多数饥饿人口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ShareTheMeal程序自发布以来，已经帮助解决全球范围内的多次大型食品危机，比如在也门、叙利亚和尼日利亚的食品危机。

用户可以在该APP上通过选择不同的目标来选择他们希望帮助的人群，还可以通过APP查看自己所捐钱款的用途，完全透明化。分享餐食也可以成为一个团队行为，用户可以在APP上创建一个独特挑战，拉入自己的团队成员，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个团队的行动。

截止目前，ShareTheMeal称62%的资金被直接用于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家庭，28%的资金将被投资于筹集资金和市场宣传，6%的资金将用来帮助运营ShareTheMeal，剩余的4%将继续用于支付各项费用。

截至2020年12月，ShareTheMeal已向31个国家的390万人提供了8900万份膳食。

借助区块链, 你可以以一种无法识别个人身份资料的方式, 看到援助人和被援助对象

@WFP/Salah Malkawi



高效, 安全, 透明

我们相信, 创新可以帮助我们扩大影响, 帮助地球上更多的最弱势人群

Building Blocks: 用区块链技术应对全球饥饿难题

Building Blocks是人道主义领域内已知最好的区块链应用程序之一。它是世界粮食计划署创新加速中心支持的一个项目。该项目于2016年由时任世界粮食计划署财务官员侯曼·哈达德(Houman Haddad)发起, 由时任世界粮食计划署创新顾问亚历山德拉·奥尔登(Alexandra Alden)在奇点大学训练营期间优化。该程序由Datarella开发。

程序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创新加速器内创建之后, 2017年, 在巴基斯坦和约旦开发了其概念验证测试。自2018年以来, 在约旦难民营发起规模化应用, 首年获益人群接近10万人。在极短的时间内, Building Blocks就证明了, 在向饥饿人群提供现金援助这个过程中, 区块链技术的价值非同一般(截至2020年中期, 已服务超过30万人)。

对于终端用户而言, 该程序使用非常简单。在约旦难民营中, 叙利亚难民可以在任何一家指定商铺中购物, 具体取决于这些商铺被分配的权利。在结账时, 无需使用现金, 只需使用一个加密的数字钱包。在收银台进行扫描, 就会对客户进行识别, 确认

其钱包余额充足后, 使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付款, 商铺将收到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付款。因此, 会有更多捐赠款项直接用于食物援助。

该程序另一个最新的应用是在全球最大的难民营——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内进行的。该系统已经服务超过50万罗兴亚人, 为妇女赋能, 帮助家庭维持社交距离。程序原本是触摸操作的设计, 在新冠疫情期间, 已经开发出二维码模式, 人们只需出具数字二维码便可以获得援助, 无需使用具有潜在接触传染的设备。

有研究显示, 向那些需要的人直接发现金是最有效的分配人道主义援助的方式, 同时也可以支持当地经济。如果这一点属实,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把分配现金的任务交给当地金融机构, 在某些情形下被证明是不足或不可靠的, 或者根本无法被送至难民群体, 因为这些难民开不了银行账户。

Building Blocks背后的区块链技术可实现参与者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之间的直接、安全且快速的交易, 无需要求银行这一的金融中介机构去连接双方。

Building Blocks不仅让难民在如何获得和花费援助现金方面有了更多选择, 还帮助世界粮食计划

署探索了区块链能否以更高效、安全和透明的方式实现现金转账。此外，最重要的是，它既能实现现金转账，同时又保护了收款人信息，控制了金融风险，也能促进更广范围的合作。事实上，对于逃离冲突地区的难民而言，保持匿名非常重要，在个人信息有可能对他们造成不利时，确保他们的隐私成为首要考虑因素。

“借助区块链，你可以以一种无法识别个人身份资料的方式，看到援助人和被援助对象，”世界粮食计划署新兴技术负责人侯曼·哈达德如是说。换言之，个人可以借助加密ID或代码来进行身份区分，出于安全和隐私考虑，无需暴露其真实身份。

Building Blocks迄今已被证明是人道主义领域内最佳的区块链体系之一，可以有效减少现金捐赠成本，确保难民匿名安全，加强高密度人群环境中的社交距离和健康安全（这一点在新冠疫情期间尤其重要）。■



以技术和数据助力 精准紧急救助

萨拉·奥兰多

2020年3月，西非国家多哥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为了应对这一危机，多哥政府启动了名为“Novissi”（当地埃维语中“团结”之意）的社会救助项目，旨在通过在非洲普及率极高的移动支付方式，向多哥最需要帮助的贫困家庭提供紧急现金援助。

多哥全国总人口为800万，其中有400万人口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1.9美元。很多民众靠打零工维生，疫情的出现切断了他们的收入来源，让生活雪上加霜。在感染病毒之前，饥饿已经是个巨大的威胁。

新冠疫情暴发后，多哥政府官员联系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效全球行动中心（CEGA）的约书亚·布鲁门斯托克（Joshua Blumenstock）寻求帮助。布鲁门斯托克一直在研究如何通过大数据来弥合多哥这样的国家所面临的信息鸿沟。他的实验室研究表明，电话记录以及实地调查可以预测卢旺达的个人财富情况，卫星图像可以追踪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贫困情况。

布鲁门斯托克通过调整其技术手段为多哥政府提供帮助，并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成员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米丽·艾肯（Emily Aiken）、曼海姆大学的苏珊娜·贝鲁（Suzanne Bellue）以及来自西北大学/创新减贫行动的迪安·卡兰（Dean Karlan）和克里斯·乌德里（Chris Udry）。他还帮助多哥政府与直接向贫困国家捐赠现金的非政府组织GiveDirectly建立了联系，后者一直在与布鲁门斯托克就如何落实其研究进行合作。自2020年3月起，该研究小组已经通过机器学习、卫星影像、移动电话数据等手段，帮助多哥政府向国内最贫困人口进行现金援助。

Novissi救助项目面临的一大关键问题是：如何在普遍不富裕的群体中，精准找出最需要帮助的人并确定救助顺序？

政府并没有完整全面的人口普查数据来帮助研究者直接快速地找出最贫困人口。多哥上一次人口普查还是在2011年，在疫情期间显然也无法通过新一轮人口普查来收集数据。



2020年4月Novissi项目刚刚启动时，政府选择重点向居住在首都洛美和第二大城市索科德的非正规从业人员发放救济金，因为这两个城市当时疫情最为严重，已经采取了封城措施。政府当时主要依靠最新更新的选举人数据库来确定受助个体，因为该数据库内有民众自己申报的家庭住址和所从事的职业。

最近，通过与GiveDirectly的合作，Novissi救助项目已经开始向贫困情况非常严重的农村地区扩展。研究小组将救助重点首先放在最贫困的村庄和社区。为了确定这些村庄和社区，他们采用了深度学习算法，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图像，以每2.4公里为一个单位区域对多哥各地的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与每个区域的人口密度相结合，找出多哥国内100个最贫困区域。之后，研究小组又通过

在政府和GiveDirectly的共同努力下，多哥农村地区有将近57000人通过卫星+手机的方法获得了Novissi的救助

手机元数据找到这100个区域中最贫困的个体进行优先救助。

在政府和GiveDirectly的共同努力下，多哥农村地区有将近57000人通过卫星+手机的方法获得了Novissi的救助。

约书亚·布鲁门斯托克1月份曾在他的Medium账号上写道，需要警惕，这种方法可能会将那些没有手机的贫困人口排除在救助范围之外。即便有这样的风险，但以手机用户为目标确定受助群体还是见效最快的，有效帮助多哥政府在疫情期间向贫困民众进行现金救助。研究团队近期对多哥全国范围内的家庭情况进行了调研，“估计有近90%的家庭至少有一部手机，这样，因为没有手机而被排除在受助范围之外的人就比较有限了，”布鲁门斯托克说。“此外，我们目前还将救助范围扩大至只要有

SIM卡就可以进行登记，接受Novissi项目的救助。也就是说，没有手机的民众可以买一张（比手机便宜得多的）SIM卡，然后将卡插入别人的手机再进行登记，获得项目救助。”未来，随着Novissi项目的发展，还可以尝试以补贴形式向没有手机的民众销售低价手机。

多哥的这一项目是疫情期间紧急救助项目中取得成功的一个。因为缺少有效的数据来确认受助群体及其需求，项目选择通过卫星和手机数据来确认，最终取得了成功，证明这种以数据为核心参考的救助方式可以进一步推广。

GiveDirectly

GiveDirectly是全球领先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通过移动支付的方式，向贫困地区特别是肯尼亚的贫困人口提供援助。GiveDirectly发现，直接给钱的援助方式不仅没有让受助者好吃懒做，也没有引发通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带来了远超救助资金的经济价值。

2021年快公司评选出了全球三个最具创意的非政府组织，GiveDirectly就是其中之一，“GiveDirectly证明了现金对于贫困地区的影响，为救助行业带来了巨大变化。”

GiveDirectly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如果给贫困人口发放一定数量的现金而不是救助机构经常会提供的食物或其他援助，会发生什么？他们的答案是：现金通常是最有效的介入。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GiveDirectly向超过25.6万人发放了超过1.32亿美元的现金救助。出于避免直接接触的考虑，其中一些是应用新技术方式发放的。

过去10年来，GiveDirectly已经向超过75万人捐赠了逾3亿美元。该组织还同很多领先的独立研究人员合作来评估现金救助的影响，并通过严格的实验性研究（随机对照尝试- RCT）来解决公共政策问题。GiveDirectly网站上有大量由他们自己和其他机构发表的论文和报告，以强有力的数据支持了该组织关于现金捐赠有效性的观点。■

<https://www.givedirectly.org/>



创意资讯

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北京峰会成功举办



本届峰会以“创意激活城市·科技创造未来”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方式举办，呈现开幕式、主论坛、分论坛、闭幕式和配套展示等几大板块，峰会线下举办地为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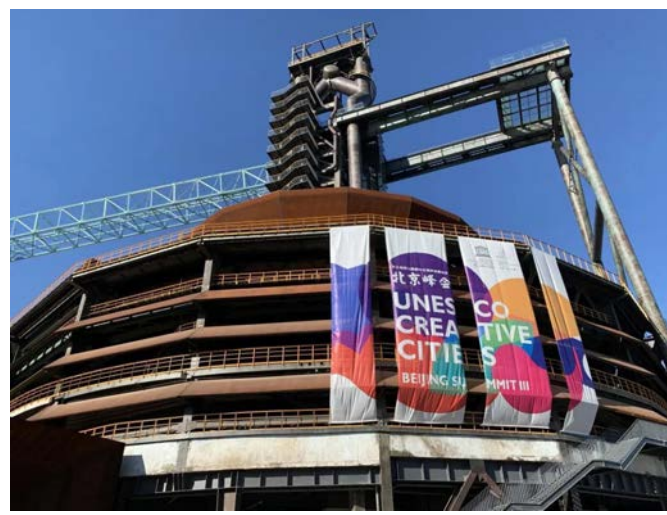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致辞

2020年9月17至18日，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北京峰会在北京新首钢高端产业综合服务区召开。会议邀请16个国家和地区30余位国际组织、城市领导、创新主体和研究机构代表发表演讲。北京市科委主任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许强主持开幕式并作主旨报告。

本届北京峰会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地方政府合作举办的首个以创意城市为主题的国际活动。峰会以塑造“后疫情时代”的未来城市为切入点，重点探讨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并行推进情况下，如何利用新技术赋能文化和创意，设计出更具前瞻性以及更优化的城市管理方法、模式和理念，并以数字经济为重点，探讨如何将跨领域技术纳入城市管理系统中，进一步改善市民生活质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北京“设计之都”是数千年悠久历史与尖端技术之间融合的典范。城市是团结、合作和创新的特殊空间。城市的发展将决定我们未来社会的景象。创意城市网络成员城市对于“设计之都”武汉的声援与支持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激发了团结的势头。

北京市科委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许强表示，北京正在以“三城一区”为主平台，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并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同时，科技与文化深度融合，“设计让城市更美好”理念深入人心，“设计之都”也正逐步成为北京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动力之源。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北京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优势，在医疗体系保障、社区防控、复工复产、改善市民文化生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场首钢园三高炉，是一座对北京乃至中国钢铁工业发展有重要贡献的“功勋高炉”，经过更新改造炼铁高炉面貌一新，更具科技感、时尚感和穿越感。

文章内容源自“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微信公众号



雅恩·蒙特比先生为时尚设计组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奖

成都创意设计周 成功举办

应成都创意设计周活动主办方的邀请，创意中心代表武文斌、郎朗于2020年11月5日-7日赴成都参加第七届创意设计周，担任颁奖嘉宾，并接受当地媒体采访。创意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雅恩·蒙特比先生受中心委托，担任本次成都创意设计周时尚设计组评委组组长。雅恩先生对成都印象很好，萌生了在成都设立分公司的想法。创意中心通过合作，为内地城市引入国际资源做出了贡献。

创意中心研究总监郎朗在接受成都媒体专访时表示：“宽松的社会氛围，才是创意阶层愿意留下来的主要原因。而创意氛围源于两方面，一是创意人群的聚集，二是良好的生活氛围。此外，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成都发展创意产业的一大优势。从长远来看，创意产业发展得好的城市，通常是文化名城，如罗马、巴黎等，因为要有足够的积淀，才能挖掘新的创意。” ■



创意中心研究总监接受当地媒体采访



《意大利世界遗产》 亮相第三届进博会 非遗展区

2020年是中意建交50周年，创意中心与祺山传媒、意大利旅游俱乐部(Touring Club Italiano)合作推出中英双语《意大利世界遗产》，由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发行，并在2020年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意大利世界遗产”展览上进行了首发。

“意大利世界遗产”展览是意大利对外贸易委员会的首个境外人文交流展示活动，在标志性的罗马建筑拱门下，以多媒体摄影展的方式展现55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展览中的所有图片均来自《意大利世界遗产》一书。进博会期间，展览活动吸引了大量观众，优美逼真的视觉呈现和多媒体互动给观众带来了良好的观展体验。

《意大利世界遗产》一书将意大利55处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景点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出来。意大利文化与旅游部、意大利驻华使馆特别为本书编写致辞，希望能借助此书，



与中国读者分享意大利丰富的世界遗产资源，促进未来两国在文化旅游、遗产保护更新等方面进行更多的交流合作。未来，意大利驻华使馆、领事馆、对外贸易委员会及其他意大利在华机构将把此书作为公共会面时的意大利官方礼品赠送给中国合作伙伴。 ■

创意中心召开 第一届咨询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



来自10个国家的专家委员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会

2020年9月25日，创意中心第一届咨询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京召开。由于受到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云交流”对话的形式展开。

会议介绍了创意中心年度工作的基本情况，宣布了咨询委员会新委员并颁发新委员证书；咨询委员们重点探讨了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背景下，如何在这个变化的时代，以创意与创新的方式持续推动全球可持续性的发展。创意中心执行主任肖澜、创意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战略规划助理总干事汉斯·道维勒，以及创意城市理论的提出者和倡导人查尔斯·兰德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创意经济部合作网络协调员卡洛琳娜·昆塔娜、欧洲设计学院学术总监里卡多·巴尔博、全球文化网络总裁/前联合国秘书处高级经济官员梅里·马达沙希、世界设计组织荣誉主席穆甘迪·姆托瑞达、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朱旭峰等来自10个国家的15位专家出席会议并发言。

创意中心执行主任肖澜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在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为许多行业带来了发展机遇。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共享平台、协同办公、跨境电商等数字技术服务对保障疫情期间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肖澜认为，数字经济无疑将成为下一个阶段重要的经济增长点，未来的发展必将进入一个更具变化的新时代，更需要创新的思维模式和创意的解决方式来应对时代的机遇与挑战。创意中心作为一个倡导以创意解决方案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平台，要在旧有体系受到冲击、新的转折即将到来的时机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心将继续搜集、研究世界各地的创意方案，推动体制的变革、科技的创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会上，创意中心咨询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战略规划助理总干事汉斯·道维勒宣布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教授成为创意中心新委员。创意中心执行主任肖澜为向勇颁发新委员证书。

汉斯·道维勒介绍了创意中心的发展历程，回顾了2019—2020年度的主要工作，并对2020—2021年度的工作计划进行了展望。他表示，创意中心在过去一年里在调查研究、宣传交流、国际合作等方面开展了务实丰富的工作，包括试点推广可持续发展创意项目和案例，组织全球范围的行业专家探讨创意城市建设，为各国文化交流、经验分享、合作共赢提供平台；建立了广泛夯实的媒体基石，与20余家新闻媒体开展合作；参与10余场国际活动，与超过30家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汉斯·道维勒表示，未来，创意中心希望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深合作，搭建更多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拓宽咨询委员会成员沟通交流、经验分享渠道，同时聚焦社交媒体运营和报道，在创意案例和成果方面为咨询委员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参考；注重人才培养，让可持续发展理念更好地融入到全球年轻设计师的设计作品当中。“今后，也希望各位专家能够继续关注创意中心，了解创意中心的工作亮点。”

与会专家对创意中心工作取得的成果表示高度认可和支持。他们纷纷表示，未来将从各自领域对接更多资源和项目，探讨深入合作。在咨询研讨环节，专家们围绕“新常态下的新思维：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和创意经济的影响”“在城市环境采取创新创意措施应对疫情”“研究、传播和数字工具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能力建设”三个议题，深入讨论疫情对全球化、创意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创新举措。他们认为，疫情给创意、设计及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提出了新的要求，更加体会到共

创、共建、共享、共商的重要性。面对疫情，各国应该携起手来，坚持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用有尊严的、更为平等的方式，通过创意去表达和回应所面临的问题，为全球的恢复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专家们还提到，尽管疫情的冲击巨大，但各国应尽可能克服困难，争取在2030年前如期完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创意中心第一届咨询委员会于2019年4月成立，包括来自13个国家的近30位委员，研究和实践跨越了创意经济、城市发展、产业规划、人工智能、网络科技、可持续发展、传播等多个领域。本次会议综合了多国专家的观点，为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如期实现提供智力支持。■

创意中心执行主任肖澜为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向勇教授颁发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证书(左:陈平、中:肖澜、右:向勇)



公益艺术教育项目展 在创意中心开展

以发现美、欣赏美、创造美为目的，为激发孩子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周围事物的好奇心，助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1（消除贫困）和目标4（优质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和桂馨基金会携手举办2020年公益艺术教育项目展。作品展旨在通过展示乡村孩子们的绘画作品，来感受他们对美的朦胧探索和认知，希望能引起社会对乡村儿童艺术教育的关注。

本次展览的作品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张程小学和湖南省龙山县大安小学3-5年级的孩子们。画作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展示儿童对梵高、霍克尼、莫兰迪等绘画大师作品的临摹，通过临摹，启发学生对美及艺术的欣赏，了解作品的基本构图及色彩感染力；第二部分展示儿童对家乡、大自然的艺术想象，通过大块色彩的运用描绘出他们心中的万事万物，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桂馨基金会是一家关注中国发展中地区基础教育的公益慈善机构，致力于改善乡村教育环境，促进教育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基金会于2017年起在中西部乡村小学尝试探索儿童美育教育的艺术类公益项目，从美育启蒙角度出发，传授乡村儿童相关知识与技巧，激发其对美的欣赏与热爱。2019年，项目内容在绘画基础上增加了戏剧和音乐，项目形式在一周短期支教基础上增加了暑期夏令营、戏剧培训、戏剧汇演。截至目前，2000余名乡村师生参与其中并受益。■



展览现场

童

《美丽的家乡》咸雪莲

美是什么？
 在孩子们的眼里，
 美是春天的花红柳
 绿，是秋天的累累果
 实，是雪后的静谧景
 色，也是一叶一草，
 一人一景



《家乡的田野》马娟

《临摹》李亚龙

中国 CHINA ECO可持续 DESIGN 设计AWARD 大奖2021



2021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
 COP-15 - CP/IMP10-AP/MOP.1
 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
 中国 北京

主办机构
 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 (BCAF)

联合主办
 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 (CFEJ)

指导机构
 北京国际设计周 大自然保护协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联合发起
 阿里巴巴公益 阿里巴巴设计
 北京工业设计促进会 三联生活实验室
 腾讯基金会 腾讯科技公益 腾讯用户
 研究与体验设计部 雅昌艺术网

艺术头条公益合作
 南周文创
 A black cover design 策展实验室
 D&Department 家琨建筑 卷宗书店
 klee klee 联想集团 品物流形
 融设计图书馆 万科公益基金会 再造
 衣银行 张达工作室 支付宝公益基金会
 自然之友 左靖工作室 同更生

媒体合作
 财新网 财新文化 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
 凤凰网 《卷宗Wallpaper》
 《The New York Times for Kids 栩栩多多》
 TOPYS 造么 ZoomeDesign
 《Design360° 观念与设计》杂志
 看什么策展

学术支持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设计创新研究中心
 广州美术学院城乡空间实践与研究中心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学术支持 中央美术学院 Yale University D&D TONGJI UNIVERSITY COLLEGE OF DESIGN AND INNOVATION 广州美术学院 合作媒体 财新 财新文化 凤凰网 卷宗Wallpaper+ TOPYS. 360 看什么策展

社区
 COMMUNITY
 营造
 BUILDING
 征集时间
 2021.NOW
 2021.4.30



www.bcaf.org.cn

你暗去的土地

你暗去的土地，你隐忍地承受着城墙。

或许你还能容许城邑持存一个小时，
或许还能提供两个小时给教堂和偏僻的修道院，
或许还能给所有拯救者留下五个小时去操劳，
或许还能看顾农夫七个小时的耕耘——：

面临无法克制恐惧的时刻你再一次化作
森林、流水和疯长的荒野之前，
你将自己未完成的画像
从万物中索回。

再赐给我片刻时间：我愿前所未有地去
热爱万物，
直到它们全部为你变得威严而遥远。

——节选自勒内·马丽亚·里尔克，
《时辰祈祷·修士生活》(陈宁译)

图片来自同名动画短片截图。该短片由
The Im/possible Future集体制作，
由马丁·哈斯 (Martin Haas) 和托尼·巴尔
塞罗 (Toni Balseiro) 导演。
[https://theimpossiblefuture.org/
dear-darkening-ground/](https://theimpossiblefuture.org/dear-darkening-ground/)